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素 质 教 育 文 库

成 功



成功

致家长和老师

——关于成功

在词典中，“成功”是一个平平淡淡的词，但在现实生活中，“成功”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成功的时代。

随意浏览一份报纸，就会看到那些成功者的故事；隔段日子再走进一家书店，就会发现名人传记类的读物又换上了新的面孔；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就会与“浓缩人生精华”的《东方之子》咫尺相处。于是，成功的偶像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对于成功的渴望便构成一种集体性情结。

“同样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这是影视明星成龙为小霸王学习机作广告时的一句台词。成龙的广告效应，使小霸王学习机的月销售额曾奇迹般地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这条一流广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紧紧地抓住了望子成龙的父母心。

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的一项调查，在问及当今家长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子女教育被列在首位。而同时，被调查的对象中，高达93%的人竟然回答，只要子女能够上大学，自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中国传统的“望子成龙”思想，在年轻一代的父母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现与强化。他们把对子女的高期望值纳入自己的人生目标，将自己年少时未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孩子尚未出生，按照“零岁方案”，胎教已开始了；孩子上学了，父母们不惜重金，四处求人，把他们送到重点学校；双休日已名存实亡，还得送他们上各类辅导班补习班。成材！升学！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在笔者供职的单位，每逢星期六，便有成群结队的家长，拎着换洗过的衣被，提着装着鸡汤、排骨汤的保温桶，乘车到70公里外的襄樊五中，去看望在那里上重点高中的孩子们。三年间，风雨无阻，无怨无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997年，《中国青年》杂志特别策划了一期《救救今天的年轻父母》。在《子女成材路上的“殉道者”》一文中，我们目睹了来自“陪读村”的采访报告：从80年代至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入北京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的学生的家长们，纷纷在音乐学院东门外的一片杂乱不堪的居民区中赁屋而居，以便就近照顾他们的孩子。那些年轻的父母，绝大多数是辞职而来的，其中，有的是省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有的是部队文工团的军官，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大好时光，来换取儿女的成材。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家吕思清，就出自这个“村”，他的父亲陪伴了他整整10年。刚到北京时，这位父亲满头乌发，身板挺拔，离开北京时却双鬓斑白，老眼昏花，背驼腰弯，这辛酸的一幕实在让人心颤。然而，能够像吕思清那样取得骄人成绩的，毕竟是凤毛麟角。音乐学院附中陈南岗校长坦率地说，一些学生的才能根本不在音乐上，可家长非让他学不可，你跟他说了破嘴都不行，到最后是什么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我们已不忍心去问那些含辛茹苦的家长，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他们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

《中国青年》接着连续四期开辟版面，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一题展开讨论。全国各地的读者对此反响强烈，短短数日，近千封来信来稿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集中起来有两点：中国的父母是当今世界上最苦

最累的父母，中国的父母应该尽快从子女教育的重压中解脱出来，父母身体力行的奋斗和创造才是对子女成材最好的教育；造成当今中国父母最苦最累的根本原因是“应试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教育的现状，中国年轻的父母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可能从苦与累中解脱出来。读者强烈呼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向素质教育的全面转变。

“应试教育”即所谓的“选拔教育”，换句话说，是一种“淘汰教育”，升学考试是它的唯一目的，它只面向少数学生，又违背了学生发展的规律，结果造成学生的片面、畸形发展。而素质教育则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使他们在知识和能力、身体与心理、人格与品德等各个方面得到协调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这里有教育观念的转变，有课程设置的转变，有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进，特别是要有测试方法与评价方法的改进，迈出的每一步，都将是艰难的，而又是必然的。全国十杰中青年教师、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成功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所谓“成功教育”即主张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一种教育模式，在教师确立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的信念的前提下，通过教师帮助学生成功，学生尝试成功，最后逐步达到自己成功。其核心是通过反复成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取得多方面的成功，并为学生的社会成功做好准备。

“成功教育”的道德基础，是由乐观主义所支撑的。我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但这时的成功已不是“出人头地”的同义词，它应该被注入“平凡”的内容。我们也并不讳言失败。但我们可以做到摒弃“失败教育”，这有赖于我们做一个成功的家长、一个成功的老师。

笔者沿着众多成功者的足迹，似乎已探寻到一些成功的奥秘。而稍一思量，又觉得无甚高论。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

凡做某事最成功的办法，亦即是最平常的办法。

与成功相约

扮演你设计的角色

——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曾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被试者包括三组学生和三组白鼠。

他告诉第一组学生：“你们非常幸运，将训练一组聪明的白鼠，这些白鼠已经经过智力训练且非常聪明了。”

他又告诉第二组学生：“你们的白鼠是一般的白鼠，不很聪明，也不太笨。他们最终将走出迷宫，但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期望，因为它们仅有一般的智力，所以它们的成绩也仅为一般。”

最后，他告诉第三组的学生说：“这些白鼠确实很笨，如果它们走到了迷宫的终点，也纯属偶然。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痴，自然它们成绩也将很不理想。”

后来，学生们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进行了为期6周的实验。结果表明，

白鼠的成绩，第一组最好，第二组中等，第三组最差。而实际上，所有被试的白鼠都是从一般的白鼠中随机取样并随机分组的。实验之初，三组白鼠在智力上并无显著差异。显然是由于进行实验时三组学生对白鼠具有不同的态度，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实验结果。学生们虽不懂白鼠的语言，白鼠却“懂得”人对它的态度。

上述实验后来又又在以学生为对象的实验中得到证实。该实验是由两位水平相当的教师分别给两组学生教授相同的内容，所不同的是，其中一位教师被告知：“你很幸运，你的学生天资聪颖。然而，值得提醒的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试图捉弄你。他们中有的人很懒，并将要求你少布置作业。别听他们的话，只要你给他们布置作业，他们就能完成。你也不必担心题目太难。如果你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同时倾注真诚的爱，他们将可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另一位教师则被告知：“你的学生智力一般，他们既不聪明也不太笨。他们具有一般的智商和能力。所以我们只期待一般的结果。”

在该学年底，实验结果表明，“聪明”组学生比“一般”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整整领先了一年。其实在被试者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聪明”学生，两组被试的全都是一般学生，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态度不同，导致了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其中一位教师把这些一般的学生看作天才儿童，因而就作为天才儿童来施教，并期望他们像天才儿童一样出色地完成作业，使得他们有了突出的进步。

这就是罗森塔尔效应：你看待人或事的方式，即是你对待人或事的方式，而且，你对待他们（它们）的方式，也就是他们（它们）发生变化的方式。态度的效应如此明显，以致于有的心理学家说：“态度决定一切。”的确，态度使我们所有的体验和活动都染上了心境的色调。

我们不能选择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但我们可以选取自己对自己的态度。

有人曾问三个砌砖工人：“你们在做什么？”

第一个工人说：“砌砖。”

第二个工人说：“我正在赚工资。”

第三个却说：“我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富特色的房子。”

简单的回答，使各人的工作态度跃然纸上：第一个工人是为工作而工作；第二个工人是为赚钱而工作；第三个工人则是为创造性的目标而工作。据说到了后来，前两人一生都是普普通通的砌砖工人，而第三个工人则成了有名的建筑师。

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助于发掘自我潜在的能力，成为“自我实现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在平庸的水平上或者只是在适当的水平上完成任务，是不会满意的。毫无例外，他们对自己承担的任务都保持了高度的责任感，并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即使面对的是平凡的工作，他们也会确立不平凡的期望，去争取不平凡的成就。

美国生物学家吉耶曼和沙利，在长达 21 年的漫长岁月里，克服同行们的怀疑和讥讽，克服了恩主中断资助的压力，克服了科学上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顽强地进行下丘脑激素的研究工作。有些时候，他们要一个一个地处理 27 万只羊脑，才能获得 1 毫克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样品。1977 年，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当记者问他们是怎样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幽默地说：“那就是逐个地分析 100 万只羊脑！”

如果没有对于成功的坚定信心，遇上几次挫折，便怀疑自己的能力，给

自己贴上不行的“标签”，那就使什么事看来都是灰暗的。这时，必须改变思考的方向，删除消极的“词句”，使自己恢复自信心，树立起自我成功的形象。

一位高三学生在一次测验中，直到老师收卷时，才发现漏做了一题。以后测验时，就总担心时间不够，脑子里都是焦虑和失误的情景，结果，成绩越来越差。

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开导她说：“失误不就是这几周吗？可十多年的学习中，你有多少成功的体验啊！”

她眼睛一亮，但很快又失去信心地说：“可那都是过去。”

老师说：“对每一次考试而言，上一次都是过去时。”又问：“如果让你从影集中选一张照片放大，你会选好的还是差的？”

“当然是好的。”她不假思索地说。

“成功的、美好的形象会增强我们的信心。心灵是一部摄影机，记忆里成功、失误的瞬间都是它的作品。考试时，你一再翻印那些失误、甚至失真的‘照片’，它只会徒增你的紧张、焦虑，为何不试试放大一些成功的‘照片’？我们需要信心。”

这位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下，在以后的几次测验中，总是带着微笑走向考场，直到走进大学。

把成功的“照片”放大，近似于心理学家们所说的“临场默想术”。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在大脑中“看”到你正在取得成功的形象，并使这种积极的形象反复呈现，成为潜意识的组成部分。

你要与人作一次交流，可以先默想说话的内容、所持的态度、运用的语气、对方的反应，以及整个谈话环境和气氛，把自己事先沉浸到谈话环境中去，这样就会取得理想的谈话效果。

你要去做某件事，动手前先在脑中酝酿一下工作的全过程，你的姿态、你的动作、所用工具、资料信息、工作对象的反应、完成后的效果。这样能使你的整个与此有关的心智、神经、肌肉得到一次协调配合的“演练”，犹如向电子计算机设计与输入一个完成任务的程序。

成功，有时很简单，只需说一声：我要成功！我能成功！然后去扮演你设计的角色。

订一个目标，实现它——有志者事竟成

羽毛球运动员龚智超，原来在湖南队时，不少人对她是否能够成材持怀疑态度。她的身体条件很一般，身高1.63米，体重不足50公斤。在国际羽坛高手如云、运动员身材高大化的赛场上，龚智超看起来并不显眼。

然而，当这位文文静静、身体单薄的姑娘凭实力跻身国家队后，人们很快对她刮目相看。她四处征战，面对世界羽坛的老将名宿，全无怯意，让她们一个一个地成为手下的败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级高手。1996年4月，她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亚洲锦标赛，就技压群芳，取得冠军。她的打法属拉吊型，与印尼名将王莲香相似。当时与王莲香对垒时，龚智超从容不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你拉我也拉，反正我比你年轻，体力比你强。结果，硬是把这位中国队的老“克星”拉下了马。从默默无闻到排名世界女单第一，龚智超只用了11个月，创造了国际羽坛排名上升的最快纪录，被国

际羽联称为“中国最新球星”。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曾对记者称赞龚智超说：“她的心里总有一个目标，然后就一步步地去实现，她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

订一个目标，去实现它。成功的起点，正在于此。当有人问及爱因斯坦成功的秘诀时，爱因斯坦写下了众所周知的公式：

$A=X+Y+Z$ （即是说，成功=正确方向+艰苦劳动+少说废话）

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就会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按照目的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发挥所有的潜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被称为“俄国科学始祖”的罗蒙诺索夫，19岁时徒步两千公里从家乡到莫斯科求学。他所在的那所贵族教会学校全部用拉丁文讲课。罗蒙诺索夫不懂拉丁文，只好先补习拉丁文。老师瞧不起他，要他坐到最后一排去，十三四岁的同学们更是指手划脚地讽刺他：“一个20岁的大傻瓜来学拉丁文啦！”老师的冷眼，同学们的讥讽，他全不放在眼里。他的目标已定，只是埋头学习，无暇顾及人家说长道短，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尊敬，并一步步走进了著名科学家的行列。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上高中时，曾任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数学老师沈元，给他们讲了数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沈元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从那时起，喜欢数学的陈景润，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一难题。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他率先证明了“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作为证明结果的“陈氏定理”，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为“辉煌的定理”。

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成为无数少年心中的偶像。“我也要像陈景润叔叔那样，拿下世界第一。”当这句话出自一位名叫袁亚湘的10多岁的农民儿子之口时，谁都觉得是幼稚可笑梦想。然而，十几年后，袁亚湘梦想成真。

袁亚湘天资聪敏，对数学尤为痴迷。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把阿拉伯数字算来算去，突然发现一个秘密：整数48分别可被2、3、4、6、8、12、16、24整除，而这8个数字之和是75，奇妙的是75又被3、5、15、25整除，它们之和又恰巧是48。他问老师，48和75是一对什么数？老师一时语塞，他没想到一个8岁的儿童竟会提出教科书上找不到的问题。年幼的袁亚湘总是超前地把下一学期的数学课程学得滚瓜烂熟。后来，老师把他从4年级跃升到5年级，与年长3岁的哥哥同班上课。

不曾料想，初中毕业后，父亲给他出了道难题。因家里无力负担，两兄弟只能有一个升入高中。哥哥年纪比他大，错过了机会，也许就不会再有学习机会了。在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抉择之后，袁亚湘辍学了。一位姓陈的老师得知情况后，惋惜地对他说：“你是棵好苗子，千万不能荒废，要想办法读书。”一年之后，袁亚湘终于又重新跨入了校门。1976年高中毕业后，他又回到了自己耕耘过的土地上，白天在天地间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用数字、公式、定理去编织色彩斑斓的梦。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他振奋不已，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一个多月，考上了湘潭大学，成了该校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一名新生。从此，他如鱼得水，尽情地遨游在数学的海洋中。

1982年2月，袁亚湘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部发来的录取通知书。他仅

用半年时间就学完了规定的所有科目，获得硕士学位。11月，袁亚湘到了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系，他的导师是国际计算数学界大名鼎鼎的鲍尔教授。短短的几年里，袁亚湘先后完成了16篇具有世界水平的论文，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就破格选进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姆学院任研究员。鲍尔教授感慨地说：“在所有的学生中，袁亚湘是出类拔萃的。”

1988年9月，袁亚湘谢绝了鲍尔先生的挽留，回国了。他又回到了阔别6年的计算中心实验楼。不久，他证明了“一类尺度算法的最小Q——阶收敛因子为1”的理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证明这一结果的人。1990年，袁亚湘被授予博士导师资格，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导师，年仅30岁。

袁亚湘的成功，首先就在于他有着一个高远的目标，就像海伦·凯勒说过的：“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会去爬行的。”

著名探险家约翰·戈达德，还仅仅是美国洛杉矶郊区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15岁少年时，就列表写下了气势不凡的《一生的志愿》。他立下志向，要“到尼罗河、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探险；登上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和麦特荷思山；驾驭大象、骆驼、鸵鸟和野马；探访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一世走过的道路；主演一部‘人猿泰山’那样的电影；驾驶飞行器起飞降落；读完莎士比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谱一部乐曲；写一本书；游览全球……”，共列有127个目标。之后，经过顽强的努力，历经18次死里逃生，终于实现了其中的106个。

人的潜力竟如此之大！订一个目标，你一定能实现它，只要沿着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性格决定命运——陈逸飞的口头禅

80年代初，国门刚刚打开，陈逸飞怀揣着38美元，只身踏上了闯荡美国的人生旅程。在大洋彼岸，他没有任何经济、人文背景，此行，他带着梦想，也冒着风险。

勇于冒险，似乎是他的一种天性。小时候，他曾将阳伞当作降落伞，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二楼阳台跳下，侥幸没有出事，却着实让他的父母虚惊一场。陈逸飞的父亲是位化学工程师，他期待着儿子长大后能如同自己一样，以技术立足于社会，但陈逸飞受到的却是来自母亲的影响，自幼爱上了绘画。

陈逸飞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随着母亲到教堂时，那管风琴浑厚的共鸣，少年歌手和谐的歌声，慈祥善良的圣母塑像，和镶嵌在门顶及墙面上的玻璃彩画，这是艺术给他的最初启蒙。进入中学后，他参加了课余美术班，窘迫的家境使他难以走进画室，周末就从母亲的菜篮中掏出蔬菜、水果甚至酱油瓶、醋瓶摆弄，练习实物写生。初中毕业后，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尽管父亲对他的选择不以为然，但当一个画家，是他梦寐以求的追求。毕业后的几年间，他创作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大型油画《黄河颂》、《开路先锋》、《红旗颂》等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屡获好评。1976年他与魏景山合作创作的油画《占领总统府》，曾获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评选一等奖，后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陈逸飞在画坊声誉鹊起之时，也被一些人冠以“形式主义倾向”，因为他对于色彩感性的过于讲究，与当时特定的环境相去甚远。在对自由奔放的艺术境界的渴望中，他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刚到美国时，陈逸飞曾在博物馆打工修画，从中接触了大量西方名画，加深了对西方油画制作的认识。但修补匠并非他的志向所在。于是，他倾其所有买了一张通用火车票作欧洲的自助旅游，遍访十余个国家的美术馆，尽情吸收大师们的养分。为节省开支，晚上，就蜷缩在火车上。生活是清苦的，而对艺术的精妙的感受却日臻丰富起来，他终于在浓郁的东方韵味与娴熟的西方技法的结合点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那些温馨弥漫的水乡风景，那些粗犷豪放的高原风情，那些吹箫拨弦的江南女子，那些奏笛抚琴的西洋姑娘，无不以杰出的“浪漫写实主义”画风，被国际美术界所称道。

当初，路过纽约哈默画廊，面对着它的富丽堂皇，陈逸飞不敢贸然跨进门去。但不出三年，他便与这家美国颇具实力的画廊签约并在此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之后，又先后举办过五次，每一次的展出作品都全部售罄。欧美不少收藏家争相收藏陈逸飞的画作。1991年，他以油画《浔阳遗韵》首次参加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会，以137万港元成交，破在世华人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1994年，他以西藏为题材的油画《山地风》，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又以286万元成交。1995年，陈逸飞与当今世界最具权威的英国玛勃洛画廊签约，成为第一位与之签约的亚洲画家。1996年底，玛勃洛画廊为他主办世界巡回画展，第一站选在生他养他的上海，然后是北京，如潮的观众在欣赏他独具魅力的画作的同时，也领略了他作为一个成功者的风采。

人们看到，陈逸飞依然那样温文尔雅，事业的辉煌，并不曾给他增添一丝骄气。他把人生旅程比作一个个小站，过了一站又一站，让生命多闪几次光，多耀几次火花，是他的理想。当他实现了作一个画家的梦想之后，又尝试用电影这种流动的画面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他自任导演，用画画儿赚来的钱，投资拍摄了《海上旧梦》和《人约黄昏》，后者曾在戛纳电影节上入围“特别荣誉奖”，并在中国电影“金鸡奖”中获得“最佳摄影”与“最佳美术指导”奖。

陈逸飞在事业上经历了荣辱与沉浮，在感情上也伴随过孤独与挫折，但人们在他的脸上，看到的总是乐观与自信。他把生命比作一个球体，上面的光折射下来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光线不同，球体就有明有暗，不可能是通体明亮的。人的一生如果光亮照得多一些，那么球体的明亮部分就多些，暗部就少些。活着，就是要努力让光亮照得多一些。在这种积极的人生信念支撑下，他成为“勇敢的冒险家”，不断地在寻求新的起跑点。当人们沉醉于他笔下低吟浅唱的江南水乡时，他已把笔触转向了浓烈淳厚的西藏民风；当他的画拍价最好时，他又去拍电影，圆他少年时代向往电影的梦。

一个梦想，就是一次飞跃。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在的才能，也都会遇上把他引向成功之路的机会，但很多人由于性格过于软弱、羞怯，或者没有勇气突破环境的束缚，而离成功越来越远。梦想，正是最大限度地谋求成功的愿望，它能使人的才能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即使身处逆境，也见不到成功的任何迹象，拥有梦想的人仍将满怀信心，一往无前，迈向生命的新台阶。

“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定要实现！”你對自己这样大声呼喊过吗？

成功不需要天才——对智商的态度

爱因斯坦到了天堂后，将与另外四个人住在一起，他向他们做了自我介

绍。

“很高兴见到你”，同室的第一个人说，“顺便告诉你，我的智商是 180。”
“好的，我们在一起可讨论量子物理。”

“我的智商是 159”，第二个人自我介绍。“很好，我们可以讨论最新的数学理论。”

“至于我么”，第三个人说，“我的智商是 132。”“很高兴”，爱因斯坦回答，“我们可以讨论目前的工艺水平。”

“很荣幸见到你”，最后一个说，“但我的智商仅 85。”“没关系”，爱因斯坦握着这个人的手说，“告诉我，你认为哪家银行的利率高？”

这个杜撰的故事表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狗的叫法。小狗千万不要因为大狗的存在而自惭形秽，小狗的叫声中自有大狗所不能替代的魅力。它应该坦然而大声地叫，用上帝赋予它的嗓音叫。

成功，的确需要足够的智商。智商，即智力商数，这是心理学智力测验中所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公式为： $\text{智力年龄} \div \text{实足年龄} \times 100 = \text{智力商数}$ 。智商为 100 上下，表示智力正常或中等；120 以上，表示聪明；130 以上，表示智力超常或“天才”；80 以下，表示愚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智力只是“正常”。不过没关系，因为成功并不需要天才，它同样青睐普通人，你所需要的仅是执着不懈地追求你的理想，直至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你的并不出众的素质开发到不同寻常的程度。

“为学不可全恃明快，要思量到迟钝处”（曾国藩语），智商高也罢，平平也罢，在“迟钝处”下苦功夫，是成功者所必备的“公因子”。

中科院院士林群，回忆起陈景润时，曾激动地说：“陈景润令我钦佩，因为他与常人不同，有超常的毅力、耐性和不惜代价的投入。”

有一次，陈景润提出：“一个三元五次多项式，怎样找出所有的解答？”林群说，即使一元问题，也无从着手，如同是海底捞针。可是，大约过了一个月，陈景润便告诉他：“全部解答都找到了，不信你可以一个一个代到方程中，看看是不是满足。”林群问他是怎么找出来的，他说：“找到一个就少一个，一个个找，就是要肯花时间。”

陈景润曾谈起他治学的秘诀：

“白天拆书，晚上装书。我就像玩钟表那样，白天把它拆开，晚上再一个原件一个原件地装回去，装上了，你才懂了。”

“做研究就像登山。很多人沿着一条山路爬上去，到了最高点，就满足了。可我常常要试上十条山路，然后比较哪条山路爬得最高。凡是别人走过的路，我都试过了，所以我知道每条路能爬多高。”

智商超群的陈景润尚且要下这等苦功夫，一般人哪能自恃聪明，而不去努力呢。明白这番道理后，还是让我们的话题回到“智商”本身，它虽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但毕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实际上，我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科学的智力测验。我们所说的智商，是对自己或别人智力高低的一种评价。智力，是由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意力等五种基本因素有机结合构成的。观察力是智力活动的门户和源泉；记忆力是智力活动的仓库和基础；想像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和富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思维力是智力活动的方法和核心；注意力是智力活动的警卫、组织者和维持者。而创造性是智力品质的集中表现，智力水平的高低

一般都可以用创造力的大小来标示。

创造力，是书写自我历史的潜在能力，是富于更新活力的生命力量。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生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的行动。”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创造力，像智力的其他方面一样，经过后天的努力，创造力是可以不断提高的。

下面，我们不妨按照美国普林斯顿创造才能研究公司总经理、心理学家尤金·劳德塞所设计的测验题，用 10 分钟的时间来测一下自己的创造性的高低。自测时，在每一个题后诚实地用“ A ”表示同意，用“ B ”表示不清楚，用“ C ”表示不同意。然后，据题后的附表经过统计，得到答案。

1. 我不做盲目的事，也就是我总是有的放矢，用正确的步骤来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

2. 我认为，只提出问题而不想获得答案，无疑是浪费时间。

3. 无论什么事情，要我发生兴趣，总比别人困难。

4. 我认为，合乎逻辑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5. 有时，我在小组里发表的意见，似乎使一些人感到厌烦。

6. 我花费大量时间来考虑别人是怎样看待我的。

7. 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比力求博得别人的赞同要重要得多。

8. 我不尊重那些做事似乎没有把握的人。

9. 我需要的刺激和兴趣比别人多。

10. 我知道如何在考验面前保持自己的内心镇静。

11. 我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解决难题。

12. 有时我对事情过于热心。

13. 在特别无事可做时，我倒常常想出好主意。

14. 在解决问题时，我常常单凭直觉判断“正确”、“错误”。

15. 在解决问题时，我分析问题较快，而综合所收集的资料很慢。

16. 有时我打破常规去做我原来并未想到要做的事。

17. 我有收集东西的癖好。

18. 幻想促进了我很多重要计划的提出。

19. 我喜欢客观而又有理性的人。

20. 如果要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两种职业中选择一种，我宁愿当一个实际工作者，而不当探索者。

21. 我能和自己的同事或同行们很好地相处。

22. 我有较高的审美感。

23. 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追求名利和地位。

24. 我喜欢坚信自己结论的人。

25. 灵感与获得成功无关。

26. 争论时，使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原来与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变成了我的朋友，即使牺牲我原先的观点也在所不惜。

27. 我更大的兴趣在于提出新的建议，而不在于说服别人接受这些建议。

28. 我乐意独自一人整天“深思熟虑”。

29. 我往往避免做那种使我感到低下的工作。

30. 在评价资料时，我觉得资料的来源比内容更为重要。

31. 我不满意那些不确定的和不可预言的事。

32. 我喜欢一门心思苦干的人。

33. 一个人的自尊比得到他人的敬慕更为重要。
34. 我觉得那些力求完美的人是不明智的。
35. 我宁愿和大家一起努力工作，而不愿意单独工作。
36. 我喜欢那种对别人产生影响的工作。
37. 在生活中，我经常碰到不能用“正确”或“错误”来加以判断的问题。
38. 对我来说，“各得其所”、“各在其位”，是很重要的。
39. 那些使用古怪和不常用的词语的作家，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
40. 许多人之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他们把事情看得太认真了。
41. 即使遭到不幸、挫折和反对，我仍然能够对我的工作保持原来的精神状态和热情。
42. 想入非非的人是不切实际的。
43. 我对“我不知道的事”比对“我知道的事”印象更深刻。
44. 我对“我可能是什么”比对“这是什么”更感兴趣。
45. 我经常为自己在无意中说话伤人而闷闷不乐。
46. 即使没有报答，我也乐意为新颖的想法花费大量时间。
47. 我认为，“出主意没什么了不起”这种说法是中肯的。
48. 我不喜欢提出那种显得无知的问题。
49. 一旦任务在身，即使受到挫折，我也要坚决完成。
50. 从下面描述人物性格的形容词中，挑选出 10 个你认为最能说明你性格的词：精神饱满的、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的、虚心的、观察力敏锐的、谨慎的、束手束脚的、足智多谋的、自高自大的、有主见的、有献身精神的、有独创性的、性急的、高效的、乐于助人的、坚强的、老练的、有克制力的、热情的、时髦的、自信的、不屈不挠的、有远见的、机灵的、有组织力的、铁石心肠的、思路清晰的、脾气温顺的、可预言的、拘泥形式的、不拘礼节的、有理解力的、有朝气的、严于律己的、精干的、讲实惠的、感觉灵敏的、无畏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谦逊的、创新的、泰然自若的、好交际的、孤独的、不满足的、易动感情的、柔顺的、好奇的。

第 50 题，下列每个词得 2 分：精神饱满的、观察力敏锐的、不屈不挠的、柔顺的、足智多谋的、有主见的、有献身精神的、有独创性的、感觉灵敏的、无畏的、创新的、好奇的、有朝气的、热情的、严于律己的；下列各词得 1 分：自信的、有远见的、不拘礼节的、不满足的、一丝不苟的、虚心的、机灵的、坚强的；其余各词得 0 分。

累计得分总数，可分为 6 个等级：得分 110 - 140，为“非凡”；得分 85 - 109，为“很强”；得分 56 - 84，为“强”；得分 30 - 55，为“一般”；得分 15 - 29，为“弱”，得分 -21 - 14，为“差”。

准确地说，这种测试反映的是你对于创造的姿态。不过，谁都知道，王军霞在赛场上是用梅花鹿那样的姿态奔跑，而摘取桂冠的。

成切需要多元智慧——情商的理念

一位心理学家曾在一家幼儿园里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请来一群小孩，并告诉他们：“这里有软糖，你们现在就可以拿一块吃，但如果等我出去办完事回来才吃，就可以得到两块。”说完，他就走了。

有些孩子急不可耐，马上就拿起一块吃掉了。另一些等了几分钟后，也把糖吃了。其余的在那里等了对他们来说显得漫长的 20 分钟，为了抵挡眼前的诱惑，有的唱歌跳舞，有的假装睡觉，一直等到这位心理学家回来。

后来进行的跟踪调查发现，那些能够等待 20 分钟的孩子长大后，为了达到目标，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并取得成功。而那些急于把糖吃掉的孩子长大后，不管智商如何，各方面的成就都比前一类低。

1995 年，美国《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在他的新著《情感智慧》中，提出了“多元智慧理论”。他特地举出这个例子，以说明情感智慧的存在及意义。除了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情感智慧还包括自我觉察、自我激励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戈尔曼还把“情感智慧”缩略为“情商”。很快，这个与智商对应的词，通过信息网络在全球流行开来，这正表明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的当今社会，人们对情商的渴求。与之同时，人们也渐渐接受了戈尔曼的初听起来觉得有些偏颇的观点：“一个人的成功，只有 20% 靠智商，另外的 80% 要靠情商，也就是与人相处和合作的品德与能力。”换句话可以说成：智商只是使人赢得机会，而情商则决定是否能够成功。因为，现代的成功者，已不可能游离在群体之外。

譬如，今天的科学实验已经不像本世纪初那样，仅仅靠一两个人就可以获得重大成果。1995 年，科学家们发现第六个夸克存在的依据时，两个实验组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超过了 800 人。他们都是高智商的人，但这时每个人的智慧只有在和其他人的智慧融为一体时，才有意义。一些充当配角的人，还必须调整自己的情绪，克服失落感，才会享受到成功的快乐。

那些自视过高，性情孤傲，难以与别人沟通和相处的人，即使才华出众，智商很高，也往往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沦为失败者。1997 年暮春时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里，在短短的几周内，连续发生了两起中国留学生自杀事件。这两人中，一位是电脑博士，另一位是生化博士后，如此优秀的人才走上了绝路，引起了扼腕叹息的人们的思索。知情人说，他们都是单身一人，平日缺少朋友，从不主动与人交谈，又都面临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前者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后者常与指导教授发生争吵。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留学生中，总有人自认是天之骄子，这些人实际上只会在学校读书，不了解外面的社会。他们以为学习成绩好就会在任何时候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结果一遇到挫折或不顺心的事，就感到非常没面子，甚至觉得没有出路。如果他们在提升自己智商的同时，能够学会驾驭心情，学会与人相处，增强承受压力的能力，成功本应属于他们。

在人们的心目中，售票员的工作无需多高的智商，而李素丽却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社会广泛赞誉的成功者，她的过人之处就恰在于情商。她说：“用力去做只能达到称职，用心去做才能达到优秀。”乘客赶车时，她不说：“您别着急，我等着您。”而是说：“您别着急，我和全车的乘客都在等着您。”几字之差，换来了车上乘客的支持。一位姑娘把座位让给一位抱小孩的乘客时，这位乘客好像这个座位就该她坐似的，没有丝毫谢意，让座的姑娘有些不高兴。李素丽赶紧走过去，逗着孩子说：“小朋友，阿姨上了一天班这么累，还让座给你，快谢谢阿姨！”小孩的母亲一听，感到失礼了，立即向姑娘道谢，李素丽的一句话，便使姑娘的气消了。

在车厢这个小社会，李素丽用自己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调节乘客的情绪，营造出一个怡人的空间。她对待乘客经常是“你发火，我耐心；你烦躁，我冷静；你粗暴，我礼貌”，得理也让人，这就是她所说的：“让乘客下了台阶，我的服务就上了台阶。”

人事纷纭，在立身处世时，既要保持自己的品性，独立不羁，又要待人以光风霁月般的风范、春风和煦般的宽容与温馨，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一段人生的修炼。这个过程，说难，很多人一辈子也达不到；说容易，只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二字。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们坐在一起闲谈时说：“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不过当他见到大部分弟子不解其意时，便离席而去。那些弟子们问曾子，老师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就是忠恕罢了。”忠恕，就是要用如同关切自己一样的心情去体察、关心别人：自己想树立的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同时，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能施加给别人。

一个人，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好感、信任和尊敬，成功之路会变得平坦起来。反之，那些恃才傲物，以自我为中心处世的人，赢得的大都只能是反对票，这无疑是在给自己的成功之路增大阻力。

有一回，被称为日本歌舞伎一代大师的勘弥扮演一位长途徒步旅行的老百姓，正当他要上场时，一个门生提醒他说：“师傅，您草鞋的带子松了。”他回了一声：“谢谢你呀。”然后立刻蹲下来，系紧了草鞋的带子。当他走进门生看不到的舞台入口处时，却又蹲下，把刚才系紧的带子，又放松了。他原本是试图以草鞋的带子都已松垮，去表现一个长途徒步旅行者的疲惫之态。正巧，那天有位商人到后台参观，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戏演完后，他向勘弥说：“您该当场教训那位门生，他还不懂演戏的真谛。”勘弥回答说：“别人的亲切必须坦率接受。当时我若是骂那个年轻人，会有怎样的结果？今天，他提醒我的是鞋带松垮的事，可是，有时碰到的就不是这一类的事。例如，我若是披上背后有了大破绽的外褂要出场，他发现了却可能会想成，‘这大概又是师傅的另一种表达剧情的演技罢’，于是，他就不敢提醒我，我呢？就这样上了舞台，出了洋相。要教导门生演戏的技能，机会还多的是。在今天的场合，最要紧的是要以感谢的心去接受对方的亲切。”

从勘弥的故事中，我们懂得，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人生的艺术，就在于使智商与情商携手共进，迈向生命的圆满。

全面地发展自己——通才取胜

1997年1月27日，《文汇报》在显著位置以《“通才教育”造就高素质学生》为标题，报道了复旦大学学生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不少用人单位去复旦大学乐于录用“专业不对口”的毕业生，主修核物理的被金融业录用，学哲学的被证券业单位录用……为何？复旦大学近年来注重“通才”教育，鼓励文理交叉渗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时不再看重“专业”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在这条报道后的“专家点评”中说，多年来，复旦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偏重于专业知识教育，造成理科的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知之甚少，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及当代科技发展

了解不多。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的相互交叉和融合日趋明显，人才培养必须要适应这一变化的趋势，由过去那种单纯培养“专门化”人才，转向培养具有宽广知识面、较强开拓创新能力的“通用型”人才教育。

杨福家教授认为，在大学毕业生的头脑里，不应有“改行”两个字。主修物理的学生最后不必都去搞物理，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以后可转入经济、管理、新闻、法律等领域。因此，培养学生面向实际的态度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有关自学能力，更显得重要。

复旦的学子们是令人羡慕的，接受通才教育之后，当他们走向竞争激烈的社会时，每人平均有三个以上的单位可供挑选。不言而喻，他们自信而从容。

美国曾对 1311 位科学家进行了为期 5 年的追踪调查，从他们取得的事业成就衡量，得出的结论是：通才取胜。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的发明者科马克是一位理论物理学教授，而同时，他对计算机技术和医学诊断技术也有较深的涉猎，正是博学的“聚变效应”触发了他科学灵感的火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的组织决策理论，也是他将多学科知识融汇贯通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院 1978 年给西蒙的颁奖词中说，在广泛的定义下，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他的著作远远超出他所从事研究的专长范围。他是文学学士，哲学博士，教过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情报信息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

当然，通才并非通晓一切，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博学而后专一，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获取尽可能多的智慧，是其真正的含义。从一些理工类大学纷纷开设文学艺术、传统文化课程来看，通才教育也不只是知识的扩展，更重要的，它是对自己的人格魅力、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的提升。

杨振宁先生在《读书教学四十年》这本书中回忆说，他很小时数学就念得很好。1934 年念完初一的暑假，他的父亲，身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的杨武之先生，想找一个人来教他，但不是教他数学，也不是物理，而是请来了后来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的丁则良先生，教他《孟子》。《孟子》是儒家哲学的经典之一，从中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孟子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在极端困苦患难中经过多方磨炼挫折，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杨振宁的人生思路，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认为远比他父亲在当时找一个人教他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另一位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的华盛顿美术馆东馆，被一致认为是美国超级建筑展览橱窗；美轮美奂的香港中银大厦，成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卢浮宫前光彩夺目的玻璃金字塔，被巴黎人视为自己的骄傲。贝聿铭 1935 年留学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接受全套美国式的建筑教育，而同时，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子的智慧，也使他获益匪浅。贝聿铭说：“我读老子的书读得很多。我想，也许他的文字对我的建筑思维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东西。”老子的“有无相生”的思想，道出了建筑艺术的全部奥秘：建筑是“空间的存在”，因此，建筑手段之“有”，是服务于建筑目的之“无”的。在线条简洁的几何图形上留出空白，使建筑整体栩栩如生、灵气飘逸，是贝聿铭作品的一大特征。而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使他更加注重建筑与周围背景的协调，香山饭店

便是他体现这一精神的杰作。

从人类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智慧，把握人生、事业的艺术，是通才教育的一个主要课题。与人文素质的欠缺相对应，中国学生技能素质不高，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出国留学的人理论比别人高出一筹，动手能力却很差，限制了创造能力的发挥。杨振宁先生在解释其中的原因时说，这并非中国人天生不会动手，今天在美国念物理的华裔，获得特别成功的，大多数如沈元壤、朱经武、丁肇中、朱棣文，都是实验物理学家，说明中国人不是不会动手，而是很会动手。关键是要培养自己的浓厚兴趣，仅仅对条件加以抱怨是不够的。

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功，往往是他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创造素质、技能素质、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多样素质的综合表现。按照“木桶理论”：假定一只木桶是由多个高低不同的木板组成的，其容量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因为当液体平面超过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时，液体就会溢出，因此，要增加木桶的容量首先必须加高最低的那块木板。这一理论更形象地启示我们，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有望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增加成功的机会。

最重要的事情是诚实——成功的基石是品质

百米赛跑，是奥运会上历史最长、最富传奇色彩的比赛项目。顷刻之间决出的“世界飞人”，骄傲地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挥动花束，任金牌在闪光灯下呈现出炫目的光彩，那是何等的荣耀。

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9.79秒的成绩打破了百米世界纪录。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金牌与鲜花，而是世人的鄙视和唾弃。在随后的尿检中，他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于是，比赛成绩被取消，金牌落在了卡尔·刘易斯的手中，本·约翰逊受到了禁赛两年的处罚。1993年3月，重返赛场的本·约翰逊服用兴奋剂被再次查出，从此，这位当年以“发令枪一响，比赛就结束了”为座右铭的新闻人物，又被处以终身禁赛。

四年之后，不甘寂寞的本·约翰逊，竟向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家法院起诉，要求取消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和加拿大田径协会对他的上述处罚。他似乎不明白，在与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较量中，他注定是失败者。

与本·约翰逊相比，1932年奥运会女子百米赛跑金牌获得者——波兰选手斯坦尼斯拉娃·瓦拉西维支——称得上是“幸运儿”，她曾经长期保持多项跑步世界纪录。1945年6月2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第一个大型田径运动会上，瓦拉西维支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仅用了11.2秒就跑完100米，直逼男子世界纪录。有人评论说，她比赛时“步伐迈得又快又大，就像一位男子”。

1980年12月，几名窃贼闯入了瓦拉西维支的家，在与歹徒搏斗时，她身负重伤。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这位知名人物。当进行下腹部手术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此人果真是地地道道的男子汉。丑闻传开，舆论哗然，瓦拉西维支被一致认为是本世纪最成功最出名的体育比赛的“性别作弊大王”。这种扭曲人性、违反天性所取得的成功，是人所不齿的。

追求成功，就是追求人生的完善，如同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一样，它要求每一个角色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那些投机取巧、见利忘义、不择手段

的作弊行为，即使侥幸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大写的人字上，留下的却是难以抹去的败笔。

某乡准备选配几名通讯报道员，消息传开，趋之者若鹜。一位年仅 18 岁的村姑表白自己已有多篇作品发表，甚至还获得过上海的大型文学期刊《小说界》小说大赛的三等奖。此言一出，一时显得鹤立鸡群，在众人钦佩的目光下，这位村姑讲述起自己的创作生涯：

“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就决心走自学成才的路子。我借来一本本中外名著看啦，琢磨啦，并学着写一些故事，稿子寄出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期盼着，可是一直杳无音讯。但是我没有气馁，没有退却，坚信勤奋就一定要有收获。终于，我的第七篇故事发表了，我高兴极了，愈发辛勤耕耘。一次，我们大队改选干部，激起了我的灵感，通过精心构思，写出了小小说《最后一票》。刚好我得知上海《小说界》杂志举办微型小说大赛，便寄了过去。不久我接到了编辑的来信，对小说提了修改意见。我改好后又寄了过去。结果不但发表了，而且还获得了三等奖。这次用的笔名是刘勇。”

村姑的娓娓叙述，使听者无不动容。不久，一篇题为《18 岁的村姑和她的小说》的通讯在省报发表，电视台的记者也闻讯赶来给她拍专题片。从此，一个个荣誉一顶顶桂冠让她应接不暇，直至出席了共青团中央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

然而，这种春风得意，转眼之间便兑换成使她无法承受的羞愧。一位地方志编辑在见到她出具的所谓《小说界》颁发给她的获奖证书时，从纸张的粗糙和措辞上的不严谨断定，那证书是伪造的。《小说界》果然证实，《最后一票》的作者刘勇，与这位村姑毫不相干，同时，也从未出具过“三等奖”的证书。“自学成才”的动人谎言就这样曝光了，村姑自觉羞于抬头见人，便过起了隐居生活。

能够对可耻行为进行追悔，倒不啻为是对生命的一种拯救。比起某些在考场上作弊而炫耀“战绩”，津津乐道作弊技巧的大学生来说，那村姑的品质似乎显得并不逊色。

据南开大学理科某系的学生透露，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们全班三十多名学生没有一个不参与作弊。成绩差的学生作弊，目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及格线”；而成绩优异的学生作弊，目的是获取高额的奖学金。尽管在很多大学都有学生因作弊而被开除的例子，但作弊现象依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令老师们痛心疾首。

1997 年初，天津的 7 所重点高校的数万名大学生陆续在一份《倡议书》上签名。而这份倡议书的内容竟然是在期末考试到来之际，向师长和社会保证：彻底杜绝考试作弊行为。这条题为《大学生拒绝考场作弊》的消息，在光明日报上作为“头条新闻竞赛”刊登后，令人们悲欣交集。

一位在美国有着丰厚收入的女士，参加了“英语学会”这个帮助各国人民学习英语的组织，来到了中国的一所大学。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美好的愿望，但失望地看到，在几次讲座后进行的一次简单的测验中，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令她无可奈何。

当她再次登上讲台时，她放下了讲义，一只膝盖抵着地，给 76 位中国大学生上了一堂使他们刻骨铭心的一课：

“我知道分数对于学生的重要性，知道你们需要一个高分去获得更好的

工作，但我不明白，如果你们没有真正的才识，如何去维系这种生活……”

“我亲爱的同学们，20年、10年或许更短的时间以后，我，一名外籍教师所讲的知识或许都会成为流水从你们的记忆中流走，我不会遗憾，但我希望，真心地希望，到那时，你们还会记得有一位异国老师曾怎样地请求你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我宁愿我的学生从我的课堂上只学到诚实。”课堂上回荡着一个坚定的声音：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honest!”（最重要的事情是诚实）

事实上，最聪明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诚实的人。正是诚实，构筑了经得起时间磨砺的成功的基石。

美国雅利安公司中国办事处有一次招聘了4名中国高级职员。主持复试的贝克先生是全球闻名的大企业家，他从一个报童成长为美国最大的广告代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一位应聘者走进会客厅时，贝克先生露出一脸的惊喜，并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原来是你！我找你找了很长时间了。”又转身对在座的另几位老外嚷道：“先生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救我女儿的那位年轻人。我划船技术太差了，把女儿掉进了昆明湖中，要不是这位年轻人就麻烦了。真抱歉，当时我只顾看女儿了，也没来得及向你道谢。”

被试者抑制住心跳，说道：“很抱歉，贝克先生，我以前从未见过您，更没救过您女儿。”

贝克先生又一把拉住他：“你忘记了？4月2日，……肯定是你！我记得你脸上有块痣。”

“贝克先生，我想您肯定弄错了。我没有救过您女儿。”应聘者坚决地说。

贝克先生愣了一下，忽然，又笑起来：“年轻人，我很欣赏你的诚实。我决定，免试了。”

其实，贝克先生根本没有女儿。而有幸参加复试的10个人中，有7个人就因为那个“莫须有”的女儿被淘汰了。他们聪明得过头了些，却不懂得：诚实，是成功的一个法宝。

成功是一个过程

迎接机遇——你是否已准备完毕

1997年3月9日，上午9时左右，祖国北疆的漠河小城仍处于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之中。而在漠河市三中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操场上，几万双热切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头顶上的天空，等待着回归周期约为3000年的海尔—波普慧星与我国本世纪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次日全食同现天空这一“世纪幽会”的临近。

这是一次天文学的盛会。中国天文学会组织了500多人的庞大观测团，他们中有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00多位天文工作者、50多位新闻记者和众多的天文爱好者，其中还包括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和港台的境外来宾。为了成功地观测千年一遇的天象奇观，他们穿越万水千山，来到漠河，因为，漠河是这次日食带上的最佳观测地区。中科院组织了39家科研单位的数百名科学家，动用了最先进的观测手段。惜秒如金的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中用长达140分钟的时间，对这次天象作大型现场直播。一位来自北京的老人，为了取得最好的观测效果，双腿跪在厚厚的积雪上。深圳的一位刚生下孩子两个月的年轻妈妈，专门到西安自费购买了2万多元的观测仪器，又向主办部门软磨硬缠，弄到了最后一张来漠河的专列的票……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抓住一个瞬间——日食的持续时间仅为2分26秒。

其实，抓住机遇，正是所有成功者的诀窍。而机遇，又大都类似于一种天象，往往出现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它来去匆匆，转眼即逝。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如同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1990年3月3日，亿万电视观众目睹参加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的6名队员，成功地徒步完成横穿南极大陆的科学探险后，在苏联南极和平站用布条做成的终点标志线上紧紧拥抱。6位勇士中的一位，名叫秦大河，由此，他成为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和鲜花。横穿南极大陆的探险活动，秦大河是毛遂自荐去的。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冰川学家，他已经默默无闻地在荒无人烟的雪山冰川上工作了多年，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后来，他有机会去过两次南极。第一次在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工作了14个月，又在澳大利亚南极局冰川研究室工作了一年，并在那里全面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第二次到南极是在中国长城站当越冬站长，又工作了14个月之久。作为一个冰川学家，能够在横穿南极大陆的过程中观察、采样、分析、研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当这个机会来临时，秦大河已“准备就绪”。有人说他的运气好，而在秦大河看来：“机遇像条河，它就在你身边流淌着。它的存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眼力来认识它，有没有能力去抓住它。有的人是没有认识到它，有的人是认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抓住它。”秦大河是善于识别机遇，而又抓住了机遇的。

如果说对于机遇的追求，需要的是忍耐与时间，那么，当机遇一旦出现，需要的则是果断与奋争。相传被誉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一次省亲时，路经江西南昌，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意在让他的女婿写一篇序文，显示才华，客人们明知其意而纷纷退让，王勃却当仁不让，阎伯屿一气之下退入后堂，叫小吏随时报告王勃写了些什么词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小吏第一次来报时，阎伯屿说不过是老生常谈；接着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伯屿听后沉吟不语；待至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不由得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连声赞叹王勃为难得的人才，并马上出来以礼相待。王勃敏捷地抓住了施展才华的时机，使自己的名字随着《滕王阁序》而流芳千古。王勃的成功，应该给“怀才不遇”的感叹者以这样的提示：如果你真的具备了真才实学，所缺乏的往往不是机遇，很多时候你只是缺乏行动的勇气，而与机遇失之交臂。因为，机遇不是绅士，不会主动向你招手，你得自己抓住它。

春秋时期，鲁国有位大夫，叫季文子。这位名士以谨小慎微而著称，任何事要他拿主意，他都要瞻前顾后，思之再三。“三思而行”这句成语，便由他而来。一般认为，这是个褒义词，用来形容一个人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稳健周到，因而少有遗漏和偏差。不过，孔子在听到弟子们谈起季文子的这个为人处世的特点时，不以为然地说：“考虑两次也就可以了。”孔子的意思是，考虑问题，慎重些当然是必要的，但也没必要过于谨慎，斤斤于细节，患得患失，拖泥带水，这样虽然可能少些差错，但也可能将机遇给丢了。不出差错并不等于成功，与其平平淡淡地过，不如大胆地去尝试。看准了的事，考虑两下，有一定把握了，就要诉诸行动。想法对不对，不在于思考的时间长短，而在于行动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面前，迅速提出 10 条不同的战略决策，军事才能可谓高矣。可是他缺乏在这 10 条对策前当机立断的能力，结果常常举棋不定，贻误战机。丘吉尔时常为此而苦恼。正如一句古谚所说的：“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如果你一下没抓住，再抓就会撞到他的秃头了。”

当然，在人的一生中，成功的机遇也绝不会吝啬得只出现一次。陷入失去某次机遇的懊伤中而不能自拔，只会使眼泪遮住发现新的机遇的视线。如果你执著地追求着，就请记住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只有五条横街的距离——成功是一个过程

25 岁的时候，侨居纽约的俄国青年雷因由于失业而穷困潦倒。他能写文章，但不会用英文写作，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白天就在马路上东奔西走，倒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只是因为这是躲避房东的最好办法。

一天，雷因在纽约 42 号街碰见了俄国著名歌唱家夏里宾先生。他小时候在莫斯科剧院，曾欣赏过夏里宾的歌声，后来在巴黎当新闻记者时，又曾访问过他。

夏里宾也认出了雷因，并且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处境。他要带这位同胞去自己的旅馆。

这时，已是中午，雷因已经走了 5 小时的马路了，他说：“但是，夏里宾先生，还要走 60 个横街路口，路不近呢。”

“胡说，”夏里宾忿然说：“只有五个马路口。”

“五个马路口？”雷因觉得很诧异。

“是的，”夏里宾说：“但我不是说到我的旅馆，而是到第 6 号街的一家射击游艺场。”

雷因顺从地跟着他走，到了射击游艺场。稍稍停留了一会，他们又继续

前进，夏里宾说：“只有 11 条横马路了。”

走到一家大戏院后，夏里宾愉快地说：“现在离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只有 5 条横马路了。里面有一只猩猩，它的脸很像我所认识的唱次中音的朋友。我们去瞻仰那只猩猩。”

又走了 12 条横马路，已经回到百老汇路，转角就到了夏里宾住的旅馆，他笑着对雷因说：“并不太远吧？现在让我们来吃中饭。”

吃饭前，流浪汉出身的天才歌唱家给雷因解释了要他走许多路的理由：“这是生活艺术的一个教训，你与你的目标之间，无论有怎样遥远的距离，切勿担心。把你的精神常常集中在 5 条横街的短短距离，别让遥远的未来使你烦闷。常常注意于未来 24 小时内使你觉得有趣的小玩意。”

夏里宾的生活哲学，使雷因豁然开朗。19 年之后，夏里宾已长辞人世，身为小说家的雷因为了纪念那一天所走过的马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美文：《只有五条横街的距离》。

其实，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横着一条漫长的人生之路，大可不必因目标渺茫就丧失信心，或因路途遥远就望而却步。像歌唱家夏里宾先生那样，在现实与遥远的成功目标之间，竖立起若干个切切实实的就近的目标，把可望而不可及的最终目的地，分解成一个个“五条横街的距离”，脚踏实地一步步朝前走，最终的目标，就终究会达到。

一位滑雪教练，带领一群新手到陡坡上教他们滑雪。站在滑道顶端的边缘，从顶端一眼望到底端，难免使那些队员感到坡陡路险，从而产生畏难情绪。为了帮助他们克服畏难情绪，这位教练采取了与夏里宾类似的艺术，他反复告诉他们不要把整个滑雪过程看成是从山顶到山下，而应将其分解开来，先想着怎样滑到第一个拐弯处，再想着滑到第二个拐弯处。

于是，队员们纷纷把注意力放在目前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上，而不是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上。他们转了几道弯之后，信心便增强了，很快就能顺利地滑下去。

滑好每一个弯道，不仅仅是增强了越过终点的信心，而且，滑过每一个弯道所留下的优美的曲线，也足以令人怦然心动。

在一个人一生的整个过程中，在某段时间处于某个环境，只能干一件特定的事。成功的人生，应当使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都呈现出丰富、美丽的色彩。

而无论你能做什么，或是希望能够做什么，行动总是成功的永恒法则，迟疑或等待，只能给人生留下一段一段的空白。

作家严文井在谈起将憧憬仅仅停留在无休止的期待中的一些人说：“这样的人多少有些不幸。他的日子同精力都白白浪费在期待一个时刻上，那个时刻对于他好像是一笔横财，那一天到了，将要偿还他失去的一切。于是他弃掉那一刻以前所有的日子而无所作为。也许真的那一刻可以令他满足，可是不知道他袋子内所有的时间已经接近花尽了。他们不曾懂得，完善的意义就是一个时间的完善加上又一个时间的完善。生命的各个细节综合起来才表现出生命”。

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原型人物塞尔柯克，在一家轮船上当领航员，因为和其他船员不和，被抛到了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恶劣的环境和难于忍受的孤独并没有使他绝望，他也没有翘首等待着偶然经过的海船来搭救。凭着自己的双手，他制造出生活的必需品。他经常用读书来消磨漫长的日子，

用引吭高歌来驱走悲伤和寂寞。五年之后，一艘英国军舰路过这片海域时，发现了塞尔柯克在岛上最高的山岗上用树干搭起的灯塔，那高悬着的两个明灯使他得救了。

总之，成功是一个过程，全力以赴，做好眼前的事，自然会有成功的体验，而远方的目标也渐渐不远了。

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做无用功

曾有一位大学生给作家梁晓声写信，倾诉自己对文学的虔诚，以及想成为作家的恒心，只因为自己是学工的，便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梁晓声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与同龄青年相比，能够考入一所名牌大学，已首先使他成为最幸运的人了。努力学习，目前对他是最合适的生活，即使他最终还是执意要当作家，大学的学习，也是有益的积累。梁晓声劝他先按捺下当作家的迫切愿望，将来大学毕业了，从业余作家当起，继而半专业，继而专业。

然而，这位大学生根本听不进梁晓声的劝告，整日的心思都用在写作上，结果，“作品”一篇也没能发表，学习成绩也一天天下降，连续补考又不及格，不得不离开了大学校园，回老家去了。

后来，梁晓声听说，他精神失常了。梁晓声痛惜道：“这多可悲呢。”

著名女作家铁凝也曾接触到一位文学爱好者。这位四川乡村女青年不远万里找到铁凝，希望在她的指导下早日成为作家。铁凝心里很清楚，一个人靠一位作家的培养而成为作家的例子，古今中外实在不多。福楼拜作为莫泊桑酷爱文学的母亲的老友，对莫泊桑进行过极其严格的写作训练，但在以《羊脂球》进入文坛之前，莫泊桑在巴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的位置上，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十余年。铁凝问明情况后，善意地向她指出，对于她，第一是职业问题，因为有了职业就有了工资，有了工资就有了衣食住行的起码保障。曹雪芹把高粱米粥冻成坨，切成块，饿了吃一块，一把辛酸一把泪地写作，实在是无奈的下策，今天的青年已无效仿的意义和必要。

那位女青年听从了铁凝的劝告，回到家乡，在一个小县城里找到了一份最普通的工作。以后她常把习作寄给铁凝指导。终于，她的文章开始在地区的小报刊上继续发表了，在她生活的那个地方，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被调到县里计划生育办公室搞宣传，生活得挺幸福。由此，她寻找到了适合于她的“坐标”。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不同结局，而成功的天平，也许本来是倾向于那位大学生的。可惜他没能找到理想与现实的合适的结合点，在捕捉那若隐若现的精灵时，已经握在手中的鸟儿也飞走了。

美国心理学家叶塞博士曾将自己20多年的心理研究浓缩成一句话：“为你所能获得的最高目标奋斗，但绝对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奋斗，固然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生活态度，而放弃无谓的抵抗，则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更为明智的生活态度。五音不全而要成为歌唱家，身材不美而要成为舞蹈家，天赋不够而要成为作家，凡此种种，大都只是无谓的抵抗，徒增伤悲罢了。

我们不必因羡慕别人的成功，便盲目地跟着别人走。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只要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就算是成功的，无论你扮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正如道格拉斯·马罗达所写的诗：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的一棵树，
就做一丛小树生长在山谷中，
但须是溪边最好的一丛小树；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
就做灌木一丛；
如果你不能成为灌木一丛，
就做一丛绿草，
让公路也有几分欢娱；
如果你不能成为麝香鹿，
就做一条鲈鱼，
但须是湖里最好的一条鱼。
我们不能都做船长，
我们得做海员。
世上的事情，
多得做不完。
工作有大的，也有小的，
我们该做的工作，
就在你的身边。
如果你不能做一条公路，
就做一条小径；
如果你不能做太阳，
就做一颗星星。
不能凭大小来断定你的成败，
不能说你做什么事都要做最好的一名。

顺其自然，明白自己的人生方向后，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就会越来越接近追求的目标。马罗达的诗，显得并不激昂，但所表达的正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智慧。如同唱歌，一般都采取低音开头，因为只有用低音开头，后面才有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才容易不断地创造出高潮来。

也请回味人们登山时的情景，仰望山顶之后，攀登的姿态总是低着头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限制之中显本领

23岁那年，杨振宁将要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了，他想到美国去，追随著名物理学家费米和威格纳从事实验物理研究。

1945年，杨振宁考取了清华留美奖学金，获得了赴美国深造的机会。但在当时，费米和威格纳都在从事绝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设法与费米多次会面，费米解释说不能指导他写学位论文。后来，费米把杨振宁推荐给著名物理学家泰勒。

泰勒发现，杨振宁在实验物理方面并不太擅长，尽管辛劳备至，却没有显示出出色的才华，而在理论物理的学习和研究方面，则表现得能力超群，于是便建议他专攻理论物理。这使原来立志于实验物理的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失望，他苦苦思考了两天两夜，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原先的主攻方向，转向理论物理。

从此，杨振宁在理论物理方面很快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硕果。1949年，

杨振宁同费米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模型，被称为“费米—杨模型”。1954年，他与密耳斯合作，提出了“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在研究自然界的四种基本作用力的过程中，这个理论已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如197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格拉肖、温伯格和萨拉姆，在所从事的基本粒子之间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统一理论的研究中，就使用了规范场理论。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关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的实验小组完全证实了这一理论，这样，曾被物理学家视为不可动摇的宇称守恒定律打破了。为此他和李政道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的非凡成就令他的老师费米深感自豪，他说过：“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结识他，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

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每当与他的学生讨论基本粒子科学问题时，也时常悄悄地笑着说：“让那位姓杨的中国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要比你我还要高明得多。”

1981年7月，杨振宁到中国科技大学讲学时说，当时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地作出改变主攻方向的抉择，是他走向成功的转折点。

1997年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出生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朱棣文教授，与法国和美国的二位学者一起分享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朱棣文由此成为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之后第五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华裔科学家。

与杨振宁有所不同的是，朱棣文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制造精巧实验装置的专家和第一流的工程师。朱棣文总是在关注物理学的最新方向并进行思考，而与此同时，在他看来，当认识到对于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之后，接下去便是一个工程学技艺的问题。他认为在实验室工作是一种享受，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这使他的实验技巧越来越娴熟，过去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实验，后来只需几天至多几个星期便能完成。不少实验，别人去做，几乎都做不出，而他则屡屡成功。

朱棣文是因为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原子的方法而获奖的。他用激光束从六个方向照射原子，使大于超音速的原子速度减慢到如同小虫蠕动一般的速度，就像一粒灰尘陷进泥浆中那样。朱棣文用“光学粘胶”这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实验。激光冷却的物理思想早在1975年就有人提出来了，朱棣文1987年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终于后来居上，用一系列难度极高的实验，使人们能对悬浮在空间近乎不动的原子进行研究的愿望得以实现。

朱棣文开始是在他的导师尤金·科明斯的影响下，在实验中找到了乐趣，后来他终于意识到，实验室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场所。正如杨振宁专注于方程式一样，朱棣文钟情于实验室，一个做“猜想”，一人做“证明”。抓住一个主攻方向，并为之竭尽全力，是他们成功的相通之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有所作为，只能将主要精力投向自身潜能的最佳发挥点上。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放弃的过程。“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所取，必有所舍，不愿接受这一平实真理的人，应该温习这样一篇寓言：一头驴，在两垛青草之间徘徊，想吃一垛青草时，却发现另一垛青草更嫩更鲜，于是，驴子来回奔波，没有吃上一根草，最后饿死了。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感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在表述“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时，黑格尔的语言已丝毫不显得晦涩难懂。

有所不为，同时也是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时，对种种诱惑的摆脱。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提倡回复简朴的自然生活，除了一个饮水的杯子和一个盘坐的土瓮外，别无长物，有一天见到幼童用手捧水喝，便把饮水的杯子也扔掉了。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拜访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时，他只是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比第欧根尼早一个世纪出生的颜回，称得上是他生活的知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曾连声称赞道：“贤哉，回也！”

第欧根尼与颜回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尽可不必赞同，但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于滚滚红尘之中，心无旁骛，对享乐加以限制，而又“不改其乐”，是应该提倡的。

有所不为，为无不果。

大路条条——给智慧换上“软包装”

一个人，只因为担心与别人失散，而把别人的方向当成自己的方向，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种迷失。要想有所成就，你得寻找自己的路。台湾作家罗兰如是说。

有这样一个故事。

自从传言有人在萨瓦河畔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金子后，这里便涌来四面人方的淘金者。他们寻遍了整个河床，还在河床上挖出很多大坑，希望借助它找到更多的金子。的确，有一些人找到了，但更多的人一无所获，扫兴而归。

也有不甘心落空的，便驻扎在这里，继续寻找，彼得·弗雷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河床附近买了一块没人要的土地，一个人默默地工作。为了找金子，他已把所有的钱都押在这块土地上。埋头苦干了几个月，直到土地全变得坑坑洼洼，他还是连一丁点金子都没见到。

六个月后，他连买面包的钱都快没有了，于是他准备离开这儿到别处去谋生。

就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天晚上，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并且一下就是三天三夜。雨终于停了，彼得走出小木屋，发现眼前的土地看上去好像和以前不一样：坑坑已被大雨冲刷平整，松软的土地上长出一层绿茸茸的小草。

“这里没找到金子”，彼得若有所思，“但这块土地很肥沃，我可以用来种花，并且拿到镇上去卖给那些富人。他们一定要买些花装扮他们华丽的客堂。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赚许多钱，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富有的人。”

于是，他留了下来种花。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不久，田地里长满了美丽娇艳的各色鲜花。

他拿到镇上去卖，那些富人一个劲地称赞：“噢，多美的花，我们从没见过这么美丽鲜艳的花！”他们很乐意付少量的钱来买彼得的花，以便使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丽堂皇。

五年后，彼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了一个富翁。

“我是唯一找到真金的人！”他时常不无骄傲地告诉别人，“别人在这里找不到黄金之后便远远地离开，而我的‘金子’就在这块土地里，只有诚实的人用勤劳去采集。”

这个故事具有双重的涵意。彼得没有像其他的淘金者那样离开那片土地，而是留了下来，说明了他的坚强；彼得没有继续淘金，而是改行种花，又说明了他的明智。成功之路并非“自古华山一条道”，我们宁愿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当你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那一条时，是应当庆幸的。当你所希望的那条走不通时，何不去试试另一条？那未必是黯淡的。成功的契机，往往出现在坚强的信念与随缘的适应携手之间。

随机应变力，更是当今迅猛变化的社会对人的智慧品质所提出的要求。

《日本之谜》一书曾介绍了日本人所追求的思想方法的柔软性：如果把现实比作复杂形状的容器的话，那么人的思想则应该像水一样，水是柔软的，把它放在任何形状的容器中，它都会紧紧地贴住容器的任何一部分不规则的表面。石头是硬的，尽管有时它本身的形状比较规则，有时还可以用明确的语言把这种形状定义出来，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形状复杂的容器中去，它却不能“柔软”地与容器相“符合”。如同软包装饮料能更有效地利用运输空间一样，给智慧换上“软包装”，就能更好地发挥人的潜能。

1993年3月17日，世界上第一种螺旋藻新药“斯普瑞胶囊”在昆明问世，这标志着我国应用生物技术开发天然藻类资源的水平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这项事业的带头人，是一位地道的书生模样的人物，名叫胡志祥。

几年前，胡志祥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时，怀揣的是一张外国文学研究生的文凭。但他不曾想到，已发给他报到证的一家出版社对他关上了大门。鬼使神差地，他又被分配到云南省科委民营企业管理办公室。研究莎士比亚的胡志祥，对哈姆雷特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有了切身的体验，为了生存，他只能与自己流连忘返的文学殿堂告别。

他放下了清高的架子，开始在商海中给自己重新定位。起初，他卖过电脑，虽然利润丰厚，心里却总不踏实，因为没有找准自己的立足点。他想到了云南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便到了一家有一大帮研究生、大学生的公司，主持云南蛇酒的开发。在一次蛇资源项目论证会上，胡志祥征求省科委解德汝先生对蛇酒开发的意见，解德汝说：“好是好，但还不是大手笔。”接着又冒出一句“我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好项目”，就对他谈起了有着浪漫、传奇故事的螺旋藻。

1962年的一天，法国的克雷曼博士在电视上看到：在非洲的乍得湖畔，一群土著卡尼姆人从湖中打捞起一种青绿色藻体，撒在沙滩上过滤，在强烈的阳光下晒干，制成粉末食用。克雷曼立刻奔赴非洲，对这种绿色粉末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螺旋藻中蛋白质的含量竟高达60%以上，同时，还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成分、生物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含量之丰富、均衡，前所未闻。克雷曼的论文发表后，像一股旋风在世界掀起一阵螺旋藻热。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发生爆炸后，日本人送去的援助品是一批螺旋藻制品。受害者吃后，核物质不断排出体外，造血功能逐渐

恢复，白细胞上升，免疫力增强，此后，螺旋藻更是身价百倍。世界卫生组织把螺旋藻推崇为 21 世纪人类最佳保健品，联合国粮农组织称螺旋藻为人类未来的粮食。

螺旋藻几乎成了神话。而中国的科学家发现，世界上最优质的螺旋藻资源就在云南永胜县程海湖。只可惜，几经周折，对这一珍贵资源的开发还停留在科研阶段。

胡志祥心潮起伏，他感到自己未来的事业，已经与那个至少有 36 亿年历史的古老物种密不可分。他跑遍昆明的图书馆，又托朋友到北京图书馆查找有关的图书、资料。当他对螺旋藻有了基本的认识后，就义无反顾地奔向程海，他要在这里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养殖基地。

胡志祥不能做学问了，但要求自己用做学问的精神来做每一件事。他先后进修过制药学、市场学、基建学，施普瑞公司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心血。胡志祥不能再去研究文学了，但他懂得，文学就是人学，而人学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人才入围在他的身边。在这个强有力的智力集团支撑下，现代化的施普瑞制药厂很快矗立在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几年之后，世界上最大的螺旋藻生产基地已在程海诞生。

面对辉煌的事业，胡志祥书生气质依旧，嘴边，仍会不时亮出莎士比亚的诗句来：

“我想，困苦可以使脸色惨淡，却未必能改变心肠。”

永不自满——谦虚使人进步

1980 年初夏，数学家华罗庚应邀在香港大学作演讲，有人问他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反问道：“我成功了吗？我成功不成功还不知道……”他真诚地解释说：“如果我还有一点成就，主要是由于自己知道自己不行，找到了差距，就有了奋斗目标。”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能者为师，有机会就学，是华罗庚一生的主张。他所说的“自己承认差一点，工作加油一点”，正是对成功者谦虚胸怀的写照。

陈景润 1955 年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时，按照李文清老师的建议，开始研读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为了透彻地掌握这部著作，陈景润把书拆成一页一页的，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整本书读了二三十遍，对每条定理都了如指掌。后来，他在书中有关“它利问题”的论证上，发现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差错，就提笔写了一篇改进华罗庚先生的结果的论文，由李文清老师托人转交给了华罗庚。陈景润另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信中谦和地说：“明星上落下的微尘，我愿帮您拭去。”

华罗庚读完论文和书信后非常兴奋，认为陈景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很有培养前途。在他的推荐下，全国数学学会特意邀请陈景润参加了 1956 年首次召开的全国性数学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关于“它利问题”的论文。华罗庚在随后的发言中，阐述了这篇论文的意义，充分评价陈景润的结果，接着又提议把他调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1957 年 9 月，陈景润到了北京。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他的研究水平得到飞跃，尤其是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 $(1+2)$ 的辉煌成果，成为世界知名

的数学家。

从这段数学史上的佳话中，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华罗庚先生作为伯乐的风范，同时也可以领悟出，真正的谦逊与真正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处于对自身价值的恰如其分的估价之中。

已经写出《堆垒素数论》这样享有盛誉的专著的华罗庚，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发现的问题，他虚心地接受了，承认“差一点”。然而，后生可畏的感觉，并无损于他的自信，因为，那个结果的改进，只会使自己的著作更接近真理，而传之久远。

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名言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但随着知识的增长，越来越谦虚，经常感叹自己的无知。有人问他：“您的学问这样广博，竟然感叹自己无知，这岂不是笑话？”笛卡尔说：“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曾经画过一个圆圈，他说，如果圆圈内表示一个人已经掌握的知识，那么圆圈外他未掌握的知识是个无限大的世界。的确如此，一个人的知识越多，知识的圆圈越大，那么作为他与未知知识接触线的圆周也就越长，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没掌握的知识是那么多，他也就变得越谦虚。”

理解了芝诺的圆圈的喻义，便会明白华罗庚说“自己知道自己不行”，绝非故作姿态的虚词，而是在广博的视野中对自身的清醒审视。这又正如法国散文家蒙田所比喻的那样，有成就的人就像田野上的麦穗，麦穗饱满而成熟的时候，总是低垂着脑袋。

当陈景润改正了华罗庚书中的一个问题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而只是拭去了明垦上落下的微尘，这是他谦逊的一面；而同时，当他发现问题时，并没有因为华罗庚是权威就否定自己，则表现出他自信的一面。自谦只有与自信相伴时，才会显示出应有的价值。

1936年，斯特拉斯曼用中子照射钡时，发现了裂变现象。但是，他迷信核物理学家梅特纳的权威，当梅特纳否定他的实验时，他只得把自己的发现扔进废纸篓。等到裂变现象被别人证实的时候，他却悔之已晚。

真正的谦虚，不是贬低自己，人云亦云，而是有自知之明，取长补短，从不足中求进取，从缺憾中求完善。

绘画艺术大师张大千曾被徐悲鸿称为“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答道：“当代的我国画坛，人才辈出，我厕身其间，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说客气话，能把山水竹石画得清逸绝尘，我不及吴湖帆；论气韵的刚柔相济，我不及博心舍；明媚软美，我不及郑午昌；画瀑布山岚，我不及黄君璧；论寓意深远，我不及陈宝山、谢玉岑；画荷菱梅兰，我不及郑曼青、王个落；写景入微，不为方寸所囿，我不及钱瘦铁；画花鸟虫鱼，我不及于非暗、谢稚柳；画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孙；画鸟鸣猿跃，能满纸生风，我不及王梦白、王慎生；画马，则当数你徐悲鸿先生，赵望云当然也是佼佼者；还有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道兄无一不在我上。徐先生说我能领500年画坛的风骚，我哪里担当得起啊！如果不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张大千如何能道得出自己的一个个“不及”？正是兼容广大，博采众长，出入古今，使张大千的绘画呈现出他人难以企及的万千气象。

在成功的天平上

以上总育一副担子——

天下没有白腹的午餐

在 1992 年度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有一位四年之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就是白春礼。

白春礼的名字为世人瞩目，是与他在扫描隧道显微学研究中的成果分不开的。1985 年 9 月，他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从事新兴学科扫描隧道显微学的研究。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同事在世界上第一次观察到了原子的清晰图像，与人合作的论文被第二届扫描隧道显微学国际会议选为大会报告并入选大会论文集。正当这时，他回国了。那时，扫描隧道显微学在国际上已成为热门学科，但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点，白春礼抛弃优越的待遇回国，正是缘自于开拓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扫描隧道显微学的迫切愿望。

回国后的岁月里，白春礼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在实验室里，每天平均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虽然科研条件比在国外差一些，但在白春礼的带领下，仍然取得了在国际上领先的成果。1993 年 8 月，白春礼作为国际扫描隧道显微学学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在我国主持召开了第七届扫描隧道显微学学术会议。此前，这个会只在发达国家召开。白春礼为此倍感自豪，他拨动原子，得心应手地画了一幅中国地图，以这种超群绝伦的方式，表达自己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自信。

回顾成功之路，白春礼曾感慨地说，主要在于自己心上好像总有一副装满了责任感的担子：“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到世上来一趟，不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事情，留下一点痕迹，首先是对不起自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的支撑下，正因为累，才感到充实，而轻轻松松，反倒是无法承受了。

白春礼 1953 年出生在辽宁丹东，父亲是个从事统计工作的普通干部。他有 4 个哥哥和 1 个妹妹，生活得颇有些艰辛。他的大哥和二哥是双胞胎，本来可以一道考上大学的，但为了早点工作，挣钱贴补家用，让弟妹能够读书，二哥只报考了中专。17 岁时，白春礼中学毕业后，得到了一个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机会，经过培训，成了一名卡车司机。那个年代，社会上有一段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说的是这几个行当吃香。但白春礼并不满足，他渴望着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自己的才智，而不该只是当一辈子司机。回家探亲时，别人都带些好吃的东西回连队改善生活，而他只带他大哥用过的课本，在别人打扑克下象棋的时候，他正好躲在一边专心地看书。四年以后，他们连队分得了两个上大学的名额，经推荐、考试，白春礼幸运地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1978 年，白春礼大学毕业前夕，得知要招收“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消息，便积极复习备考，每天晚上都要熬夜到三四点钟。为了不影响同屋人的睡觉，就用报纸把灯泡罩得很低。结果，报纸都烤糊了，不几天就得换一张。当时，报考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的有 500 多人，最后只录取了 24 人，白春礼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同学中有的还是他大学时的老师。

正是心中总有一副担子，白春礼在自己的生命之旅中，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

在人生的这副担子上，一端系着我们的希望，另一端则系着我们所付的代价。你有多大的希望，你就应该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望着天上，指望能掉下馅饼，这是对懒散者的写照。在他们看来，下苦功夫的人，都显得傻气。而最终，真正聪明的，只是那些怀着理想并苦苦追求的人们。

1824年1月27日，已是暮年的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对爱克曼谈起他的自传《诗与真》续编时，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

作为哲学家的康德说：“在生活中达到了（绝对）满意——这本身就是一个征候，它表明这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安逸，一切动机都已停止，感觉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也迟钝了。但是，这样一种状态就像心脏在动物机体中停止了工作一样，是与人的精神生活格格不入的。”

1945年4月，爱因斯坦在退休前对斯特恩教授说，他正在苦心推敲相对论的某些变化，他的退休决不会中断这项工作。在爱因斯坦看来，只要有一天你得到了一件合理的事情去做，从此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点奇异的色彩。

这三位大智大慧者都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于生生不息的创造之中去承担自己的责任。

给我们的心上放一副担子，会给我们加上压力，这就在我们已经达到的愿望和应该达到的愿望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正可以激发出我们生命的潜能，如同拉紧的弓箭一般，越是紧张，射中的目标就越高远。

当然，过于沉重的担子，也会把人压垮。能够承受多大的分量，也是衡量成功大小的一个砝码。

衣带渐宽终不悔——坚持才会成功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人间词话》这部美学名著中，他借用宋词名句，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为取得成功而必备的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

古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北京大学毕业的女才子樊锦诗，当年读到这段话时，对王国维运用古人的词句表达自己思想的高超艺术，深为叹服。只是不曾想到，那三种境界，也正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1963年7月，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来，可以留在北京，或者回到上海，而她却选择了敦煌。那时，国家即将对

敦煌洞窟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工程开始前，要进行多方面的石窟考古，正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而在樊锦诗的眼里，敦煌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樊锦诗与另两位同学随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赴敦煌实习。列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穿行。宿白先生给他们讲起了敦煌的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敦煌大地盘踞着一条绿龙，它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那时的敦煌是一个风调雨顺、林茂粮丰的富庶之地。然而盘踞在北部大漠的黄龙，却总想霸占这块水草茂盛的地方。于是黄龙和绿龙之间，展开了连年争战。绿龙屡战屡胜，黄龙请来盘踞在世界风库的青龙助战，仍然不是对手。遗憾的是，居住在绿龙身边的人们自毁长城，他们揭掉绿龙身上的鳞甲，砍断绿龙的巨爪……绿龙终于精疲力竭，抵挡不住黄龙的攻击，流泪离开了。泪水化为泉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这就是月牙泉。那蜿蜒起伏的鸣沙山，就是黄龙的头颅。只要一刮风，鸣沙山上的沙子就呜呜直叫，这是青龙赶来和它会面。令人感动的是，善良的绿龙临走时将自己的尾巴割断，后来便化成了有名的莫高山。敦煌的后世子孙不忘绿龙的恩德，在莫高山上开凿了一个又一个石窟。

“有志气的新中国大学生，应该学习绿龙的精神，砍断自己的尾巴，在敦煌扎下根来。”宿白满怀期待地望着自己的弟子们说：“再造敦煌的辉煌，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就由你们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敦煌终于到了。樊锦诗一头扎进了千佛洞。那升腾飘舞的飞天壁画，千姿百态的菩萨彩塑，洋洋大观的佛国故事，莫不使她为之倾倒。每天，她爬着蜈蚣梯钻进洞窟考古，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然而，猛烈的风沙与恶劣的饮食，渐渐让她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住，以致于有一天，她晕倒在冰冷的石窟里。

那次实习，她是含泪离开心中的圣地的。现在，她擦干眼泪，与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恋人彭金章告别，又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而这一去就是30多年。

樊锦诗全身心地投入到敦煌学的考证和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莫高窟209窟的佛教故事画》、《莫高窟发现的丝织物及其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论文，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高度评价。她被公认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三代传人。

人们亲切地称樊锦诗为敦煌的女儿。肆虐的风沙早已使这位俊秀的上海姑娘面带风霜，正像宿白先生曾经希望的那样，她在敦煌扎下了自己的根。丈夫儿子的千万声请求，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的召唤，都没能使她与敦煌分离。敦煌已离不开她，而她也离不开敦煌了。“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妻子，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樊锦诗总是将内疚的泪往肚子里咽。

最终，彭金章带着两个孩子全家迁往甘肃。临走前，彭金章对武汉大学的同事们笑道：“敦煌胜利了，彭金章投降了！”而樊锦诗则因为亲人的到来，心里更踏实了，她可以与敦煌相伴一生，而再无后顾之忧。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是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的。这往往需要作长期的努力，必须有顽强的坚持精神。马克思翻阅了1500多种参考书，学习了几十种语言，历时40年才写出煌煌巨著《资本论》；歌德在20多岁时开始写《浮士德》，到82岁时完稿，整整花费了60年的心血；爱迪生试验蓄电池，失败了10296次，但他并

不气馁，终于在第 10297 次取得了成功；当维尔穆特于 1997 年 2 月 22 日宣布运用克隆技术培育出第一头取名为“多莉”的绵羊而震惊世界时，他已经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地研究了 25 个年头。

当有人问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成功的奥秘时，他回答得很干脆：“告诉你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虽少了些王国维“三境界”说的诗意，毕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专注于自己的目标——罗丹的启示

斯蒂芬·茨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奥地利作家。他的小说代表作《象棋的故事》、《心灵的焦灼》和传记文学《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作品，构思巧妙，情节生动，加上他刻意追求的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茨威格还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特写，三联书店出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再现了历史上的 12 个重要时刻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是广受欢迎的畅销书，已重印多次。

茨威格是作为一个诗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1901 年，20 岁的茨威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1906 年又出版了《早年的花环》。虽然已有不少人对他的作品大加赞美，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总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加完美一些。

有一天，在比利时著名作家凡拉爱朗的介绍下，茨威格在巴黎认识了雕塑大师罗丹。罗丹热情地邀请他到乡下的雕刻室去看看自己最近的作品。那是一尊女性的半身像，罗丹觉得已经完工了，但审视一会后，忽又喃喃自语道：“只有那肩膀上面，线条仍旧嫌太硬。对不起……”这时，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茨威格的存在——

他捡起一柄塑像用的木质小刀来。小刀在柔软的泥土上轻轻拂过，使像身的肌肉发出一种更细腻的光泽。老头子的手指活泼了起来，眼睛里放着光芒。“还有这里……这里……”他又修改了别的几处地方，再退后一步，细细观察。然后又把架子转过背来，喉咙里喃喃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有时他欣然微笑，有时他眉头紧皱，有时捏了一点泥，加到像身上去，又轻轻地抓掉一些。

如此继续了半小时，一小时……他从没有对我说一句话。除了创造他理想中的画像之外，他什么都忘记了。似乎天地之间只有这工作的存在，好像上帝着手创造世界的第一天那样。

直到丢下小刀，他才想起茨威格来，“对不起，先生。我简直把你忘记了。但是……”罗丹对自己的失礼非常过意不去，茨威格却十分感激地紧握着他的手，在他看来，这一天所得的教训，比在学校里多年的用功还有益处——

一个人可以如此完全忘记了时间空间与整个的世界，这个认识，使我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感动。这一小时，使我把握住了一切艺术、一切事业成功的奥秘——聚精会神；集中着所有的力量以完成不论大小的一件工作：把我们容易分散、容易旁骛的意志贯注在小小的一点。

我觉得遗忘一切其他事物而集中意志以求完美的热忱，就是我过去所缺乏的。除了工作，好像自己都不存在，这是成功的秘诀。我现在知道舍此以外，别无神妙的方法了。

茨威格这篇《成功的秘诀》的隽永小品，生动传神地表现了艺术家罗丹那种忘我专注的工作精神。其实，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这一类佳话早已屡见不鲜。

据说牛顿有一次在做实验时，一位朋友来看他，等了好半天，牛顿也没有出来。这位朋友饿了，便把牛顿作为午餐的烧鸡吃掉，将骨头留在盘子里走了。过了好长时间，牛顿从实验室里走出来去吃饭，看到盘子里的鸡骨头，不禁笑道：“我以为我还没吃饭，原来已经吃过了。”还有一次，牛顿在做实验时，肚子饿了，就煮上鸡蛋继续做实验，等他想吃鸡蛋的时候，打开锅一看，煮的却是一块怀表。牛顿在精力高度集中时出现的这些轶事是不足怪的。他的助手回忆说：“他很少在两三点钟以前睡觉，有时一直到五六点钟才睡觉……特别是在春天或落叶时节，他常常六个星期一直留在实验室里，不分昼夜，炉火总是不熄。他通夜不睡，守过一夜，我继续守第二夜，一直等到他完成实验才罢休。”牛顿也曾说过：“如果说我对世界有些微小贡献的话，那不是由于别的，都只是由于我的辛勤持久的思索所致。”

古希腊天文学的始祖泰勒斯，每晚都要到外面去观测星象。有一回，不留神落在一个坑里，过路的人嘲笑说：“你用心观察天上的情况，却看不见脚下的事情。”两千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作哲学史讲演时，饶有兴致地提起这段故事，并用充满辩证法意味的口吻点道：“他们不知道哲学家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观看那更高远的东西。”

罗丹、牛顿、泰勒斯，他们的工作态度，正是时间学中的“持续效应”的生动体现。时间所产生的效能，同样遵从“整体大于部分简单相加之和”这一系统论的至理名言。人的大脑工作要达到最佳状态，必须将时间作整批的运用，以保持其效应的持续性，这样才能一气呵成地获得预期的目标。

长时间专注于某一目标，固然需要有浓厚的兴趣和坚韧的毅力，同时，还得准备一片甘于寂寞的心境，隔离于嘈杂喧闹的外界环境。爱因斯坦在1905年完成《狭义相对论》以后，经过10年的酝酿准备，在1916年的某一天，告诉家人任何事都不要干扰他。接着他一连16天没有走出房门，当他走出房间时，手里拿着几张写满了数学公式的稿纸，那就是改变了人类世界观的广义相对论。

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62年因参与测定DNA的双螺旋结构，荣获诺贝尔奖后，登门来访和求见的人络绎不绝。为此，他设计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上面写道：

“克里克博士对来访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因您的盛情而给您签名、赠送像片、为您治病、接受采访、接受来访、发表电视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后作演讲、充当证人、为您的事业出力、阅读您的文稿、作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当主席、充当编辑、写一本书、接受名誉学位……”

对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待遇和荣誉，克里克都一概拒绝了。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缺乏生活乐趣的人，只因为一旦屈从，他便不能保证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如果向克里克请教成功的秘诀，他也会像茨威格那样说：

聚精会神，集中着所有的力量，以完成不论大小的一件工作。

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对艰苦说句没关系

1997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以“黄土壮歌”为题，叙述了刘笑的成功之路。

刘笑，山西省柳林县薛村乡农民，首届全国十杰青年农民之一，全国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

同很多回乡知识青年一样，刘笑曾经渴望着能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一开始，他挤在了搞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一个身高不足1.5米的驼背残疾人，没有参军、招工的奢望。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青年自认为唯一可走的路，能写出点名堂，就不用端着泥饭碗了。

于是，他把自己往废窟洞里一关，就写了起来。小说、诗歌、散文、曲艺、电影剧本，样样都练。用各种稿纸、作业本、烟盒纸、牛皮纸写出来的草稿，摆起来足有一人高。一封封投稿信发出去，又一封封地退了回来。有人劝他：“别写了，你写不成的！”刘笑不服：“我用3年时间，如果写不成就自杀！”

3年过去了，4年也过去了。刘笑的几百万字文稿，仍然没有一个变成铅字。他渐渐绝望了，再往外投稿时，把笔名写成“留笑”或者“流笑”。他知道，所有的亲戚邻居，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把他的作家梦当成一个笑话。他想，我这一辈子，大概也只能在社会上留下些笑料，流传些笑话罢了。

刘笑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揣着书稿，来到《吕梁英雄传》的作者、文坛“山药蛋派”领袖马烽的家里。马老先生谆谆教导一番，掏20块钱送他走了。一个20岁的小伙子，人生没体验过的东西还很多，就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确实可笑。

文学梦彻底破灭。刘笑把4年间写出的所有文稿都抱到黄河滩上，一把火烧了。他坐在水边，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看着黄河奔流不息，滔滔北去，这个失败了的“文人”，感受到了这条大河宏阔的胸怀。他不想去死，他还要试一试别的活法。

一开始，照着报纸上介绍的致富门路，刘笑养过鸡，养过兔，种过天麻，种过蘑菇，逮过蝎子，逮过土元。但是，因为技术还不到家，又不熟悉市场，干一样赔一样，几年过去后，刘笑已经欠下了将近2000元的债。在80年代初的吕梁农村，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大概命运之神觉得把刘笑折磨得够了，终于向他露出一丝微笑。乡里的农业技术员推广地膜覆盖技术，碰上了刘笑。当时，还没几个人相信这种新的种植方式，无偿赠送的地膜也无人认领。刘笑在外面闯荡过，毕竟眼界开阔了一些，他决定试试这个新事物。

他说服家人，划出近一亩宝贵的水浇地做试验。刘笑把他视为生命的最后一注，投在了西瓜上。结果赢得了满堂红！经过地膜覆盖的西瓜，比常规种植提前20天上市，卖了个好价钱，总收入1800元，多年的陈债，一次还清。

第二年，他承包了4亩河滩地，用地膜覆盖技术试种了21种蔬菜。半年时间纯收入6000多元。收获的季节，刘笑的卖菜车轰动了周围各大集镇。这个受惯了冷眼的人第一次发现，人们用羡慕和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1985年秋天，刘笑被授予“吕梁青年致富先锋”称号。当年底，当上了薛村乡团委书记。这超出了刘笑原来对自己的人生设计。要干就干出个样子来，刘笑捏着一把劲。

他自己花钱买来优质瓜种和地膜，肩扛手提，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办起了西瓜技术培训班。岂料，响应者不多，他跑了 13 个村，总共才发展了 28 户。刘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这 28 户农民的瓜田上。一辆破摩托车驮着他，没日没夜地进行巡回辅导。3 个月后，瓜熟蒂落，28 户瓜农平均收入过千元。

28 户瓜农的成功，拉开了一场科技致富的序幕。第二年，刘笑以这 28 户农民为基础，组建了吕梁山区第一个农民专业科技协会——“薛村乡西瓜协会”。很快，又膨胀为“柳林县西瓜协会”，然后是覆盖整个吕梁山区、跨越晋陕两省河川地区的“吕梁山西瓜集团”。“刘会长”、“刘书记”成了最受当地青年欢迎的人。

1995 年，刘笑又自告奋勇，到乡里两个特困村兼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两个村，他实现了吕梁农业史上的又一大突破：在干旱缺雨的高山上种植蔬菜，把过去只能在水浇条件好的平川地带种植的青椒、黄瓜、豆角等等都搬上了山顶。他苦思多年的旱地水作物全封闭种植技术获得了成功。

刘笑的这种技术思路其实很简单：在对蔬菜进行覆盖的时候，把垄背和垄沟一块儿铺上地膜，把天上降下的雨都积存在垄沟里。雨过天晴，再往积水沟的表面覆盖上一层地膜，又防止了积水的蒸发。每一垄农作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在垄坡上朝作物根部斜扎一排孔眼，让积水自动下渗，一滴水都浪费不了。

刘笑的这项发明，与以色列的滴灌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却简化到了极点，更适合于处于干旱状态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了解了刘笑的发明后，感叹道：“什么是学问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学问！”

刘笑一直在拚命地闯，拚命地干。在经过一次次失败之后，终于获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在于他坚忍不拔地与命运抗争，同时也在于他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选定在脚下的土地上。劳动使他感到充实，创业使他有了成就感。农村的相对落后，反而提供了有志青年大展宏图的机遇。那里的机遇，不仅留给了刘笑们，也留给了已跳出农门的大学生们。这样的故事，已屡见不鲜。

辽宁大学生物系毕业生谭立萍和她的同班同学、爱人王贵春，1992 年，主动放弃了优越的都市生活，卷起铺盖到农村当农民，把学到的知识用在食用菌的培植上，并创办了沈阳市丰源菌蕈研究所。几年后，他们的年收入近百万元。乡亲们亲切地给谭立萍送了个“蘑菇皇后”的美名，共青团沈阳市委授予她“沈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何风华，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遗传所 96 届毕业生，在毕业分配时，作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回家乡从事农业科研。何风华的老家在湖北江汉平原，那里是国家粮棉生产基地，但耕作方式还是传统的一家几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业应该远远不止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为家乡做些贡献！”何风华带着满面朴实的笑，向送行的人说：“再见了，上海！”——这是《文汇报》的一期封面故事：回家。何风华前面的路不会平坦，但我们更愿意相信，他会成功的。

理想之花，只有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离别了安逸，你选择了艰辛，但不必后悔，成功会报答你的。

歧视是一种力量——在逆境中造就自己

查理·罗斯在读高中毕业班时，是最受老师宠爱的学生。他的英文老师布朗小姐，年轻漂亮，富有吸引力，是校园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查理深得布朗小姐的青睐，他们在背后笑他说，查理将来若不成为一个人物，布朗小姐是不会原谅他的。

查理后来真的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这大概与毕业典礼上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毕业祝辞完毕后，开始发毕业证书。当查理走上台去领取毕业证书时，受人爱戴的布朗小姐站起身来，当众吻了一下查理，向他表了个出人意外的祝贺。

毕业典礼之后，人们本以为会发生哄笑、骚动，结果却是一片静默和沮丧。许多毕业生，尤其是男孩子们，对布朗小姐这样不怕难为情地公开表示自己的偏爱感到忿恨。不错，查理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也曾担任过学生年刊的主编，还曾是“老师的宝贝”，但这就足以使他获得如此之高的荣耀吗？有几个男生包围了布朗小姐，为首的一个质问她为什么如此明显地冷落别的学生。

布朗小姐微笑着说，查理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她特别的赏识，如果其他人有出色的表现，她也会吻他们的。

这番话使别的男孩得到了些安慰，却使查理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他已经引起了别人的嫉妒，并成为少数学生攻击的目标。他决心毕业后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值得布朗小姐报之一吻。毕业之后的几年内，他异常勤奋，先进入了报界，后来终于大有作为，被杜鲁门总统亲自任命为白宫负责出版事务的首席秘书。

当然，查理被挑选担任这一职务也并非偶然。原来，在毕业典礼后带领男生包围布朗小姐，并告诉她自己感到受冷落的那个男孩子正是杜鲁门本人。布朗小姐也正是对他说过：“去干一番事业，你也会得到我的吻的。”

查理就职后的第一项使命，就是接通布朗小姐的电话，向她转述美国总统的问话：您还记得我未曾获得的那个吻吗？我现在所做的能够得到您的评价吗？

阿特兰德讲述的这篇《老师的吻》的故事，犹如花发两枝，相映成趣。布朗小姐那轻轻的一吻，竟然从正面鼓励与反面刺激这两个方面“造就”了美国总统和白宫首席秘书两位“大人物”。

得到赞赏和提携，处于顺境之中，人们都是这样希望的，因为这无疑会增大成功的机率。受到冷落和压制，处于逆境之中，当是人们并不愿意碰上的，不过，这种“负效应”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又往往是成功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大伟上复读班时，成绩在班上倒数第五，他一直认为自己完了，没什么出息了，只是因为父母仍抱着希望，才被迫去复读。有一次，教他英语的那位张老师让他在课堂上背单词，他却躲在课桌下读武侠小说。张老师很生气地说：大伟，你真是没出息，你不仅糟蹋爹娘的钱还耗费自己的青春。如果你能考上大学，全世界就没有文盲了。大伟当时气得仿佛要炸开了。他噌地跳离座位，跳到讲台上指着老师说，你不要瞧不起人，我此生必定要上大学。说完便把武侠小说撕得粉碎。后来，大伟真的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几年后，张老师不幸得了骨癌，另一位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去看望他，并提起了大伟。张老师突然老泪横流。他让老伴取出了一幅旧照片，照片上，

一位书生正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微笑。张老师说：“10年前，他是我教的那个班里最聪明也最不用功的学生。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当面讲：‘像你这样的学生，如果考上大学，我头朝地转三圈……’”

张老师接着哽咽着说：“对有的学生，一般的鼓励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用锋利的刀子去做他们心灵的手术。很多时候，别人的歧视能使我们激发出心底最坚强的力量。”

布朗小姐与张老师，都不愧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用满含爱意的冷落与“歧视”，激发出奋发向上的力量。只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冷落与歧视，并不含有什么善意，但那又有何妨？

林肯在当选美国总统那一刻，整个参议院的议员，那些出身望族，自认为是挤进了上流社会的人，未曾料到要面对的总统是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于是，当林肯首次在参议院演讲的时候，一位态度傲慢的参议员站起来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所有的参议员都大笑起来，为自己虽不能打败林肯却能羞辱他而开怀不已。

林肯等笑声停下来后，坦然地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永远是鞋匠的儿子，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得那么好。”参议院一片静默。林肯又转身对那个傲慢的参议员说：“就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修正，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是我从小就随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艺术。”然后他对所有的参议员：“对参议院里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我一定尽可能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说到这里，林肯流下了眼泪，所有的嘲笑声全部化成赞叹的掌声。

长斯担任菲律宾外交部长的罗慕洛，有一次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席间，和原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展开了激辩。罗慕洛指出维辛斯基的建议是“开玩笑”。突然之间，维辛斯基把他所有轻蔑别人的天赋都发挥了出来，他对罗慕洛说：“你不过是一个小国家的小人罢了。”

罗慕洛知道自己的国家和维辛斯基的相比，不过是地图上一点而已。自己穿了鞋子，身高也只有1.63米。但是，他不能让别人以为他可以任凭侮辱，而不加反驳。维辛斯基刚一说完，罗慕洛就跳起身来，告诉联合国大会的代表说，维辛斯基的形容是正确的。接着便引用圣经中的话说：

“此时此地，把真理之石向狂妄的巨人眉心掷去，使他们的行为有些检点，是矮子的责任！”

维辛斯基凶狠地瞪着眼，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罗慕洛由这段经历引发，写出了《愿生生世世为矮人》一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矮而自惭形秽，相反，却从矮小看到了优势。因为矮，起初总被人轻视，后来有了表现，别人就觉得出乎意料，不由得佩服起来，在他们心目中，成就就格外出色；因为矮，所以要世人承认他真正是伟大的人物，于是就在知识的积累、能力的锻炼、智慧的增长、口才的训练等方面都比别人格外努力，用后天所取得的长处来弥补先天的短处。

一个人有没有作为，和个子大小无关。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如拿破仑、贝多芬、济慈、康德等，都是矮子。博格斯的身高只有1.6米，却曾是NBA篮球场上的最佳控制后卫，从前听说他要进NBA而笑倒在地的同伴，后

来却把小时候和博格斯一起打过球作为炫耀的资本；邓亚萍身高 1.5 米，曾被认为身材太矮，无发展前途，但她毫不气馁，经过自强不息的拼搏，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世界冠军的奖台上，在世界女子乒乓球的发展史上，铸起了“邓亚萍时代”的丰碑。

成功之前，我们逆风而行，压力反倒使我们超水平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成功之后，我们充满自信，那些冷嘲热讽已不必在意。

对命运说：不！——你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1997 年 11 月 10 日下午，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来到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向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 4 位中国文化界人士授“友谊勋章”。被授勋的有著名作家、画家、翻译家高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和著名俄罗斯歌曲翻译家薛范。在频频的闪光灯下，薛范与另外的三位一样，显得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然而，薛范的名字，却一直并不像他译配的歌那样著名。在公共场合，当人们为他作介绍时，如果提起名字，对方只是礼节性地地点头，但如果说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翻译者，立刻就会看到热情和惊喜的目光。在许多场合，这句话往往成了方便之门的通行证。有一次，北京的苏联歌曲爱好者，专门给薛范开欢迎会。来者当中，有杂志的主编、翻译家，有处长、局长、总经理。这些带着各种头衔的人，一见到薛范，便一改往日的矜持，不论相识与否，都称薛范为老师，对他崇敬备至。他们争相演唱《列宁山》、《纺织姑娘》、《山楂树》、《共青团员之歌》、《歌唱动荡的青春》等原苏联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更是被独唱、重唱、合唱了 3 次，就像是学生在给老师做汇报演出。

很多人是见了面才知道，译配那些旋律优美、催人奋进歌曲的薛范，身体残病得那么厉害，瘦小的身躯，总是蜷缩在轮椅上。薛范两岁时得重病导致双腿瘫痪，身体发育很不正常。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大学，但到学校报到时，人们看到他的腿一点也不能动，没有接收。回家后，他蒙头睡了几天。展示生命力量的欲望，终使他振作起来。1953 年，薛范翻译的第一首歌，发表在上海广播电台办的《广播歌曲》上，那一年，他 19 岁。几十年来，薛范自学了英、法、俄、日等外语，译配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首歌曲，其中，原苏联歌曲近一半。

薛范没有职业，也没有成家，对自己的处境，他总是坦然相对。他说，要活，就好好活，做点事情。残缺的身体，依然绽放出美丽的生命之花。

1996 年底，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寻找工作。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93 级学生唐均，用中、英、法、德、阿拉伯、印地文、日文、满文等多种文字写的自荐信，寄给了一些他梦寐以求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见了他的材料后，认为他的条件完全符合该馆人才需求。不料，当一位副馆长到南京面试后，却面露难色而去。另外的几家用人单位也一样，他们并不测试他的专业水平，只是对他的身体状态反复考问。

唐均患有先天性“白化病”，白皮肤，白头发，白眉毛，眼睛极度近视。这正是用人单位对他退避三舍的原因。1974 年，唐均出生在四川宜宾地区江安县一个贫寒的家庭。不幸的生活，反倒使他很早就懂事了。上学以后，由于弱视，即使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他的学习主要靠听，下课

了再借同学的笔记抄。惟有学习，使唐均找到了藉以自慰的所在。1993年，唐均参加高考，他的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名，并高出重点院校分数线79分。南京大学录取了他，这使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唐均一年级便轻松过关。后来又选修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门门考试都在90分以上。他不满足于这些大语种，又转而开始学习国家最为紧缺的一些小语种。1994年初，新华社报道北京一家书库中堆着数以百万计的满文资料无人问津，发出了“救救国宝”的呼吁。唐均为国宝而痛心，他向黑龙江满语研究所汇钱邮购了满语教材，满文成了他自学的第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从大学二年级起，唐均开始苦修女真文。这是被语言学界公认的一种既无人讲、也缺乏文字教材的“天文”。唐均在学校图书馆茫茫书海中百般寻觅，才找到一本《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凭着其中繁琐难懂的考证，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整理出语法、词法，并用一个寒假编出一本收有500多个词汇的小词典。几个月后，他已经可以阅读女真文献了。

后来，在一本研究西夏文化的著作上，唐均发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先生的地址，立即写信求教。史先生惊异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有心此道，很快回信并寄赠了一套西夏文学习教材。

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得知唐均想学梵文但找不到教材，便将自己新近翻译的《梵文基础读本》寄赠给他。从此，唐均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爬山者，翻过一座山头，又继续去翻另一个山头。

为了学习语言，唐均省吃俭用。家里每月寄来100元生活费，他还要从中扣出一些钱买书。上大学四年，他每天早晚两餐，都只吃稀饭、馒头，中午才买一个素菜，一年到头，极少吃荤菜。他没进过一次大百货商店。南京玄武湖公园近在咫尺，他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

在唐均的床头，贴着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唐均说：“既然上天赐给我这么一个躯体，我怨天尤人也于事无补。我想，只有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才能在社会上立住脚。”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看到唐均刻苦学习稀有语种的报道后，立即要求有关方面解决他的经济、求职或深入学习上的困难。南京大学减免了他的1200元贷款，并四处奔走，帮助他联系理想的单位。

唐均是幸运的，最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特批名额，招收他为史金波先生的研究生。唐均研究稀有语种的夙愿变成了现实。

人生注定会有许多磨难和艰辛，而身体的残缺带给人的痛苦，也许远远超过其他困境带给人的痛苦。但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向命运挑战，体内的强大生命力就能够战胜体外的创伤。

模特出身的古巴美女奎罗特，是1989年世界最佳田径女选手，在1993年初的一次意外事故中，被烈火焚烧，面容被毁，全身三度烧伤。10天以后，怀孕6个月的女婴引产夭折。然而，严酷的厄运没有使她丧失生活的勇气，经过和命运的顽强抗争，奎罗特带着满面烧痕一身伤疤，重返跑道，并奇迹般地在1995年世界锦标赛上夺得800米金牌，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800米银牌。而她真正赢得的是比奖牌更加珍贵的东西——

对命运说：不！

代跋：成功不是偶然

失败不是命运

我们常说：“某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意思是说：这其中包含着有志气，有决心，有毅力，有善于捕捉时机的智慧，有创造时机、操纵环境的才干等等。

真正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可以得到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相信，失败也决不是命运。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命运，其实，如果我们肯冷静地观察，就可发现，命运还是操纵在自己手里。坚强的人不会因为环境的不利就消失了斗志，只有那些优柔寡断的人才在外力的阻挡之下低头退缩，改变了自己的志愿。

朋友！你也看到过在外力阻挡之下消失了斗志的人吗？你不觉得那是很可惜的吗？

我们常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有天赋的聪明和才气。在我们看来，他是可能有点成就的，他自己当初也以为是可以有点成就的。可是到后来，其中有的人青云直上，发挥了自己的专长，而有的人却在生活的琐碎项目中消失了。

“为什么？”我常常这样问，于是，我去发掘其中的原因。

我发现许多人都是太懒散，他们以为来日方长，反正有的是时间，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总不会不成功的。可是，懒散会成为习惯，他们慢慢地安于懒散逸乐的生活，而他们那点可贵的天赋就在弃置不用之下生锈或发霉了。当别人还不免为他可惜的时候，他自己却早已忘记自己是可能有所成就的了。

有些人辜负了他自己优越的天赋，是因为他太聪明。他看不起埋头苦干的人，笑那些想走上成功之路的人们是傻瓜。

你也看到过笑人们是傻瓜的聪明人吗？在这些聪明人的脑子里想来：一样是拿薪水，一样的吃饭穿衣、娶妻生子，少付出一些力气，老板也不会骂我，更不会开除我，你们那样兢兢业业，又是何苦来呢？可是，他不知道，我们对上司交待容易，维持生活也绝不困难，而怎样才能向自己的生命交待，才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责任，和最大的课题。

有些人越走离他的目标越远，是因为他的舵把不稳，所以只能随着潮水的冲击，跟着风向的吹动，忽东忽西，忽前忽后。他没有坚决朝向自己目标行进的魄力，一生在迁就环境。结果，他就被环境淹没、沉落下去了！你说，这不也是一个悲剧吗？可是，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有人做这种悲剧的主角。

不要做聪明的傻瓜！在一部美国西部电影里，有一句对白说“苦干近乎愚蠢”，可是，到后来证明，只有近乎愚蠢的苦干的人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和别人。假如你有聪明的天赋，我奉劝你千万找到那点近乎愚蠢的干劲。

只有傻干、苦练的人才可以真正显出他的聪明。也只有时常笑骂别人“傻瓜”的聪明人，才是真正的傻瓜。

国语流行歌曲中，曾有过一首很受欢迎的“真善美”。那首歌词很动人，好像是一个历尽艰难的艺术家用沉痛的笔调写出来的一片心声。其中有几句，颇为语重心长：

“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

真、善和美，是构成艺术品的主要条件，也是一切成就的主要条件。人

们想要有所成就的话，一定要在途中一样一样地克服那些因循，那些苦闷，那些徘徊瞻顾，才能避免被牺牲，避免被埋没，才不致于中途残毁。能以自己的毅力，把握方向，度过这些难关的，才是剩下的硕果。任何成就都是要饱经挫败，历尽风霜的。

成功不是偶然的，失败也不能全怨命运。

你想要的，上帝自会给你，只要你说得明白。

（摘自《罗兰小语》）

